臺大歷史學報第 61 期
2018 年 6 月，頁 393-446

BIBLID1012-8514(2018)61pp.393-446
2017.9.26 收稿，2018.2.13 通過刊登
DOI: 10.6253/ntuhistory.2018.61.08

§研究討論§

臺南清萬壽亭初址與區位意涵探析

張 伯 宇*

提 要

清康熙五十年（1711），臺灣巡道陳璸（1656-1718）擇臺灣府邑郊永康里之地，初建萬壽亭，作為三大節的祝釐場所，今已不存。近年相關文籍或因古志記載萬壽亭南向且其前有德慶溪流經之說，遂界定德慶溪源北濱、現國立成功大學勝利校區一帶即該亭肇建地點。本文比對查考多幅清代輿圖，檢視梳理文書記載內容，歸納得出舊萬壽亭基址點位座落小東門、開元寺和大北門間的三角形地區內，近乎介於臺灣鎮標中營營盤和開元寺兩地一線之間，距離開元寺約莫當時的 1 里至 2 里路程，而鎮標中營營盤係在今成功大學光復校區。據此，本文重新推定萬壽亭舊址應在北區仁愛里西境之東豐路一帶，南距德慶溪源頭約 1 公里。此一推定範圍並得以由其空間使用的變遷脈絡、歷史環境的地理關連與位置敘寫的重新解讀等面向，獲得論證支持。

萬壽亭選址除了可能反映地質環境條件的考量外，作為皇權象徵，使之得以與旁鄰高級軍事區相互生產臺島最高治權核心場域的空間意義，且因地界在府城中路防務上的戰略重要性，亦能和前述軍事區發生緊密連結，其區位意涵聯繫了清代郡治中自崁頂山至城西、從馬房山到德慶溪間之權力意象和軍事功能地景，此有助於理解並形塑今日當地文化資產空間的歷史脈絡價值。

關鍵詞：臺南　萬壽亭　德慶溪　古輿圖　區位意涵

* 國立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副教授
70005 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 2 段 33 號；E-mail: pychang60@mail.nutn.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 言
一、臺南萬壽亭沿革
二、清領時期書籍中有關萬壽亭位置的記載
三、萬壽亭地緣關係的探討
四、萬壽亭區位意涵之探析
結 語

前 言

在中國，當朝皇帝的壽誕被訂定為節日（聖節），始於唐開元年間（713-742），[1]此後歷世沿襲，蔚成典制。至元朝，聖節與元旦、冬至並稱三大節，明、清兩朝亦同。[2]自「聖節」肇立，各代均有皇帝於該日接受臣工外使朝賀之儀例，[3]京外的地方官員則就所在舉辦祝壽典禮，諸多政區為此專建萬壽宮或龍亭，迎奉象徵皇帝的萬歲龍牌（天子之位）入其內安置，以便拜賀。[4]

1 《舊唐書》〈本紀第八・玄宗（上）〉開元十七年（730）記事有載：「八月癸亥，上以降誕日，宴百僚於花萼樓下。百僚表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為千秋節，王公以下獻金鏡及承露囊，天下諸州咸令宴樂，休假三日，仍編為令。從之。」參見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點校本），頁 193。

2 宋人王楙撰著之《野客叢書》記載：「國家官私以冬至、元正、寒食三大節為七日假。」明人丘濬撰著之《大學衍義補》云：「竊惟今日承前代故事，為三大節：元旦、冬至、聖誕是也。」清人秦蕙田撰著的《五禮通考》亦言：「前明以元正、冬至、聖節為三大節，我朝因之。」由此推論，聖壽日與元旦、冬至並稱三大節應自元代開始。參見王楙撰，鄭明、王義耀校點，《野客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頁 235；丘濬，《大學衍義補》，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1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 46，頁 547；秦蕙田，《五禮通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8 冊，卷 136，頁 183。

3 秦蕙田，《五禮通考》，卷 140，頁 301-313。

4 秦蕙田，《五禮通考》，卷 140，頁 313；王爾敏，〈清廷《聖諭廣訓》之頒行與民間之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永曆十五年（清順治十八年，1661），招討大將軍延平王鄭成功（1624-1662）為謀長遠計，率軍東渡臺灣。鄭氏居臺傳承三世，為示尊奉明朔，皆以永曆年號紀元，且「長至萬壽節，必設龍亭，率其官屬，朝賀如禮」。[5]臺灣納歸清國版圖後，福建分巡臺灣廈門兵備道兼理學政陳璸（1656-1718）在康熙五十年（1711）擇定於永康里新建萬壽亭，以供文武各官三節祝釐之用。自斯時起，該建物即成為清代臺灣最正統的皇權象徵之一。[6]

有關陳璸所建萬壽亭的具體地點，〈臺南市寺廟的建置〉指出其近崁頂山德慶溪源頭，即今東寧路國立成功大學宿舍建築群處；[7]〈臺南府城的城防〉和〈臺南市宗教誌〉兩文的附圖上，萬壽亭舊址被標記於成功大學勝利校區勝八舍、勝九舍與大學路 18 巷間的德慶溪源頭處（圖一）。[8]《臺灣地名辭書（卷廿一）——臺南市》中有關萬壽亭位置之界定，係徵引〈臺南市寺廟的建置〉的內容。[9]近期坊間刊行的〈臺南市區時空地圖〉或參採前列文獻，亦將萬壽亭舊址標繪在成功大學勝利校區宿舍區內，接鄰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以下簡稱臺南一中）東校區之處。[10]惟稽閱臺灣舊志或古籍中涉及萬壽亭的文字和輿圖記載，其指稱或顯示的位置資訊卻未能和上述點位相符合。

講拾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2 期（下）（1993 年 6 月，臺北），頁 262；馬曉林，〈萬歲牌概說〉，《南開大學報》第 1270 期（2015 年 6 月，天津），版 3。

5 郁永河，《裨海紀遊》，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4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頁 51。

6 李文良，《清代南臺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1680-1790）》（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1），頁 189。

7 石萬壽，〈臺南市寺廟的建置——臺南市寺廟研究之一〉，《臺南文化》新第 11 期（1981 年 6 月，臺南），頁 52。

8 石萬壽，〈臺南府城的城防——臺南都市化研究之一〉，《臺灣文獻》第 30 卷第 4 期（1979 年 12 月，南投），頁 163、圖 1-圖 3、圖 5；石萬壽，〈臺南市宗教誌〉，《臺灣文獻》第 32 卷第 4 期（1981 年 12 月，南投），頁 43。

9 施添福總編纂，王世慶編纂，許淑娟等撰述，《臺灣地名辭書（卷廿一）——臺南市》（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頁 307。

10 張祐綾，〈臺南市區時空地圖〉（臺南：B 面文化工作室，20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一　現傳清代萬壽亭初址位置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職是之故，本文嘗試藉由梳理清領時期相關輿圖、文書和田野調查資料，就萬壽亭舊址所在進行探考，並對於其區位選擇和區位重要性的意涵加以析論。

一、臺南萬壽亭沿革

臺灣入清後，慶賀萬壽聖節之典禮原在郡學明倫堂舉行。[11]康熙五十年（1711），臺邑文武官員鑒於明倫堂內空間狹窄，羅拜不便，[12]加上翌年屆逢康熙皇帝六旬大壽，時任巡道陳璸因此選擇永康里之地新建萬壽亭。[13]萬壽亭樓高二層，「前立午門，旁列朝房；亭後為祝聖殿，慶

11 薛志亮主修，謝金鑾、鄭兼才總纂，《續修臺灣縣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4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 59-60。

12 劉良璧纂輯，《重修福建臺灣府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7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 249。

13 丁宗洛，《陳清端公年譜》，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20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賀其中」。[14]康熙五十六年（1717），接繼陳璸擔任臺灣廈門兵備道的梁文科有感於萬壽亭「規制弗完」，於是「就舊址重修」，改原祝聖殿為軒，增建新祝聖殿、配殿、僧舍、廡廊、朝房、牆垣、東、西二門、霓臺等，建築佔地計長 40 餘丈、寬 20 丈，另於西闕外營造箭亭一座。[15]

康熙六十年（1721），臺灣島內發生朱一貴事件，萬壽亭地帶係重要戰場之一。該年四月清安平鎮中營把總李茂吉（?-1721）等部與朱一貴（?-1722）黨眾激戰於此；[16]六月下旬，南澳鎮總兵官、署理臺灣鎮總兵官事藍廷珍（1664-1730）統大軍自西港仔南下，直逼臺灣郡城。朱一貴領隨眾棄城出走，府治遂復，藍廷珍乃繼之率兵肅清萬壽亭地區的朱部餘黨，並駐防該地；[17]閏六月初二日，來自下淡水溪六堆的侯觀德、李直三等數千名義民，護送「萬歲聖旨牌」至臺灣府，奉入萬壽亭中，[18]

究室，1964），頁 65。

14 王禮主修，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0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 151；劉良璧纂輯，《重修福建臺灣府志》，頁 249；魯鼎梅主修，王必昌總輯，陳輝等編纂，《重修臺灣縣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1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 193-194。

15 梁文科，〈重修萬壽亭碑記〉，收入王禮主修，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頁 254-255。按：梁文科於康熙五十四年至五十七年（1715-1718）擔任福建分巡臺灣廈門兵備道。

16 《臺灣通志》云：「李茂吉，……臺灣安平鎮把總也。朱一貴亂，茂吉請以五百人為前驅。副將許雲壯之，令從征；戰於萬壽亭……。」《碑傳選集》〈李弁茂吉傳〉亦言：「朱一貴之亂，茂吉自請於副將許雲，乞一旅率弟侯鵬為前驅殺賊。……四月晦日，戰於萬壽亭……。」參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通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3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 586-587；藍鼎元，〈李弁茂吉傳〉，見錢儀吉彙纂，《碑傳選集》，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22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頁 463。

17 藍鼎元，《東征集》，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頁 9；藍鼎元，《平臺紀略》，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頁 15-16；劉良璧纂輯，《重修福建臺灣府志》，頁 427、476；魯鼎梅主修，王必昌總輯，陳輝等編纂，《重修臺灣縣志》，頁 558；李元春，《臺灣志略》，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頁 76-77。

18 覺羅滿保，〈題義民效力議效疏〉，見余文儀等主修，王瑛曾編纂，《重修鳳山縣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4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 3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彰顯起事協助官軍平亂的正統性。秋季，萬壽亭受颶風侵襲而傾毀。《平臺紀略》載：「八月十有三日辛未，怪風暴雨，屋瓦齊飛。風雨中流火條條，竟夜燭天。海水驟漲，所泊臺港大小船，擊碎殆盡，或飄而上之平陸。拔大樹，傾牆垣，萬姓哀號，無容身地。」[19]《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亦載：「八月十三夜，颶風大作，雨大如注，火光閃閃灼天，發屋碎舟，營盤傾倒；官哨商漁船俱覆，軍民溺死無算。」[20]萬壽亭之圮應與此次災變有關。雍正元年（1723），官方鳩資重建，置僧舍，奉香燈。[21]

乾隆十六年（1751），時任臺灣縣知縣魯鼎梅以萬壽亭位於城外郊野，往返費時，維護耗力，而府學明倫堂已經更繕，寬敞尊嚴，遂與文武各官商陳日後逢遇節令典禮時移回明倫堂辦理。次年，巡道金溶（1706-1778）、臺灣府知府陳玉友（1704-1754）議行。[22]此後，永康里萬壽亭的功能由朝賀之所轉變為寺院僧舍。乾隆十九年（1754）臺灣縣知縣章士鳳（1753-?）曾改祀先農神於原萬壽亭，[23]但其空間仍因缺乏維護而漸趨荒舊。[24]乾隆五十一年（1786）冬，林爽文（1756-1788）立旗抗官，之後全臺震動。為保郡治，清軍布防府城內、外要地，守禦戒備，

19 藍鼎元，《平臺紀略》，頁 21。

20 劉良璧纂輯，《重修福建臺灣府志》，頁 476。

21 劉良璧纂輯，《重修福建臺灣府志》，頁 249；魯鼎梅主修，王必昌總輯，陳輝等編纂，《重修臺灣縣志》，頁 194。

22 魯鼎梅主修，王必昌總輯，陳輝等編纂，《重修臺灣縣志》，頁 194；余文儀主修，《續修臺灣府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2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 311；薛志亮主修，謝金鑾、鄭兼才總纂，《續修臺灣縣志》，頁 60。

23 余文儀主修，《續修臺灣府志》，頁 313。

24 成文於乾隆三十年的〈新建萬壽宮碑記〉載：「今上御極十有七年，文武僚案議就郡庠明倫堂設龍亭行禮；蓋一時權宜之計，而永康舊址亦廢為僧舍，就荒。」《臺灣通史》云：「萬壽寺：在城東永康里。康熙五十年，建萬壽亭，為朝賀之地。……乾隆三十年，新建萬壽宮於城內，而寺仍存。然以寺租撥歸崇文書院，漸就傾頹。」參見蔣允君，〈新建萬壽宮碑記〉，收入薛志亮主修，謝金鑾、鄭兼才總纂，《續修臺灣縣志》，頁 499；連橫，《臺灣通史》，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2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 587-58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舊萬壽亭一帶亦在其中。[25]

乾隆三十年（1765），臺灣府知府蔣允焄另新建萬壽宮於城內東安坊縣學之東的校士院舊址，次年告成。[26]乾隆四十二年（1777）知府蔣元樞（1738-1781）修葺完竣，立碑為記。[27]日治明治三十年（1897），萬壽宮被充作臺南地方法院宿舍，[28]權屬沿襲迄今。此間清代建築已經歷拆改，不見原貌。或有文獻資料述及目前臺南地方法院院長宿舍即康熙五十年陳璸始建之萬壽亭初址，乃為訛誤。[29]

二、清領時期書籍中有關萬壽亭位置的記載

（一）康熙與雍正年間

陳璸在臺灣廈門兵備道任內的康熙五十二年（1713）冬季，請建文昌閣（又稱奎光閣）於府學朱文公祠後方。[30]康熙五十四年（1715）文昌閣竣工完成時，[31]陳璸作記立碑，其文云：

---

25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載：「東則舊萬壽亭，……飭守備邱能成帶兵三百名，李步雲帶兵二百名，就此剳營。」參見不著撰人，《欽定平定臺灣紀略》，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0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 150。

26 蔣允焄，〈新建萬壽宮碑記〉，頁 500。

27 蔣元樞，〈恭修萬壽宮碑記〉，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南部碑文集成》，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21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頁 100-101。按：《續修臺灣縣志》載：「萬壽宮，在東安坊縣學宮之東，……四十年，知府蔣元樞修建，修皆陳朝樑董其事（有記見「藝文」）。」乾隆四十年（1775）或為蔣元樞啟動修建萬壽宮的時間。參見薛志亮主修，謝金鑾、鄭兼才總纂，《續修臺灣縣志》，頁 59-60。

28 臺南廳編，《臺灣省南部臺灣誌（三）》（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頁 94。

29 駱芬美，《被誤解的臺灣史：1553-1860 之史實未必是事實》（臺北：時報文化，2013），頁 237。

30 陳璸，〈建文昌閣詳文〉，見王禮主修，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頁 233-234；魯鼎梅主修，王必昌總輯，陳輝等編纂，《重修臺灣縣志》，頁 188；丁宗洛，《陳清端公年譜》，頁 72。

31 王禮主修，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頁 7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登茲閣也，瞻焉四顧：東峙大山，層巒疊翠，動振衣千仞之思；南望鳳山，騫騰隱在几席間；西則洋洋大海，波濤洶湧，風檣出沒，變態不可名狀；其北有萬壽亭穿雲而起，君門萬里，何日得出此島與海內諸英俊交游，歷金馬、上玉堂為一快？[32]

碑記中稱萬壽亭具有「穿雲而起」之高度，或許是誇飾，[33]然此亭座落於文昌閣北方則應當為地理事實的描述。

康熙五十九年（1720）成書的《臺灣縣志》載及，康熙五十年時臺島官員「爰鳩工擇地，建萬壽亭於永康里之北」。[34]同書所附輿圖中，使用圖案和文字標註重要之市街聚落、汛塘營盤和官衙公署，萬壽亭亦包括在內，其被標註於總鎮署之上方、中營之左方偏上，亭門朝中營方向（參圖二）。[35]

《臺灣縣志》所附輿圖是以中國傳統山水畫式的技法製作，具有散點透視的特徵。[36]描繪時以西部海岸為前景、內陸為遠景，整體的透視縱深乃是向東消失，就全區域尺度言之，其方位標定系統概括以頁面左側向北、右側向南；但若從局部的地方尺度觀之，由於各個設施地物的位置和規模大小皆屬認知示意，並非植基於實測，圖內部的方位系統和比例尺空間變異度大，地物間空間幾何關係的扭曲現象顯著，資訊品質並不佳。圖中萬壽亭下方的十字大街採左側為西、右側為東之方位對應，而位在府邑東南方的舊社街，[37]大約是現今歸仁區看東里一帶，[38]乃被標

32 陳璸，〈新建文昌閣碑記〉，頁 253。

33 日明治三十七年（1904）出版的《臺灣堡圖》顯示，原臺南市內海拔高度最高處不及 30 公尺，萬壽亭高兩層，日常狀況下應無「穿雲而起」的可能。參見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臺灣堡圖（下冊）》（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6），頁 344、348、349、353、354、399、404、405。

34 王禮主修，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頁 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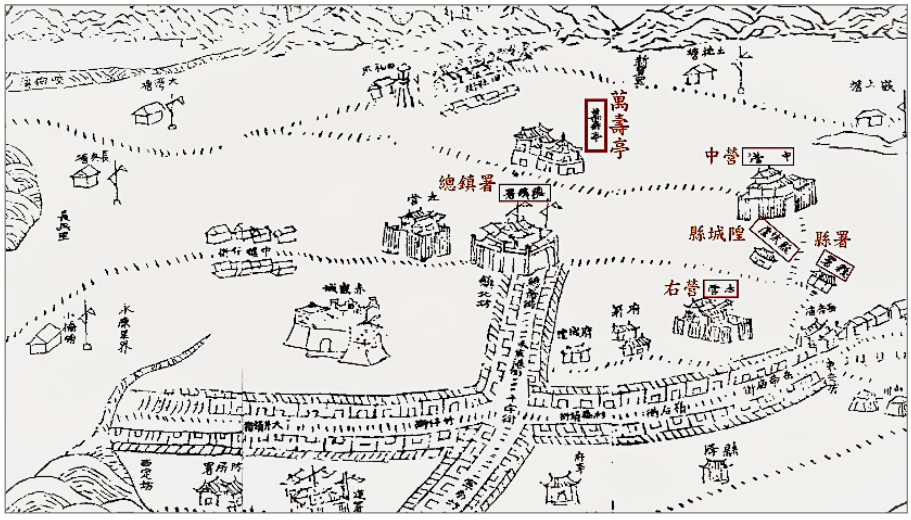
35 王禮主修，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輿圖頁 8-9。按：總鎮署即鎮守臺灣總兵官公署，在鎮北坊；此處之中營，指鎮標中營，在永康里。參見王禮主修，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頁 70。

36 散點透視是指繪圖時在縱深處理上具有多個消失點的透視方法。

37 《臺灣縣志》載：「舊社街，在歸仁北保。」《續修臺灣縣志》亦指出城外村野「東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註於總鎮署和永康里中營左上方。大灣塘約今永康區大灣，地名尚存；長興塘應為今仁德區太子廟一帶，[39]兩地中點近乎位居府城之正東，[40]然在圖中大灣塘和長興塘亦皆繪於府城左上方。上述事實顯示，四坊至舊社街間圖面範圍之東方有轉朝左上方的現象，與十字大街的方位系統呈現不相一致。



圖二　清康熙年間《臺灣縣志》所附輿圖（局部）

資料來源：改繪自王禮主修，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輿圖頁 8-10。

曰歸仁南里（距城二十里）、歸仁北里（距城二十五里，有街曰舊社街）」。參見王禮主修，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頁 92；薛志亮主修，謝金鑾、鄭兼才總纂，《續修臺灣縣志》，頁 11。

38 吳遐功，〈明鄭時期二層行溪流域漢人之拓墾〉，《嘉南學報（人文類）》第 31 期（2005 年 12 月，臺南），頁 673。

39 范勝雄，《府城叢談——府城文獻研究（三）》（臺南：臺南市政府，2003），頁 80。

40 《臺灣縣志》輿圖中，大灣塘標記於長興塘之右（以南），惟康熙二十二年（1683）前後完成的〈臺灣地里圖〉標註大灣塘於長興塘之左（以北），康熙中葉的〈康熙臺灣輿圖〉同樣如是，據此對照，《臺灣縣志》輿圖上兩塘的相對位置或有誤植。又，《臺灣縣志》輿圖中大橋塘繪於小橋塘之左下方（西北方），但前者應在後者之西南方，其南、北相對位置亦有錯置的現象。參見林天人編撰，《皇輿搜覽——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明清輿圖》（臺北：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2013），頁 124-125；不著繪人，〈康熙臺灣輿圖〉（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藏）；王禮主修，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輿圖頁 8-10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由圖二可見，臺灣縣縣署、縣城隍廟前與右營之間，繪有一段官道線向左至總鎮署。[41]總鎮署處鎮北坊，今公園南路北側、臺南公園西側停車場，原陸軍兵工配件廠；[42]縣城隍廟亦在鎮北坊中，約位於今臺灣鐵路管理局臺南車站前成功路口附近。[43]臺灣鎮標右營（游擊署）與臺灣縣署均在東安坊，鎮標右營於清同治年間改制為道標都司，[44]原鎮標右營游擊署並改為道標營都司署，[45]都司署址約在今臺南車站前圓環西南側；[46]臺灣縣署位於鎮標右營（游擊署）東南，[47]即近臺南車站之南。換言之，該段官道大致上是自東安、鎮北兩坊交界處往西北而行。另有一段官道線係由上述官道線旁分而出，起於縣城隍廟和臺灣縣縣署間，彎繞縣城隍廟右上方，穿中營經萬壽亭右側，續向大灣塘、長興塘之間延伸。縣城隍廟傍居縣署，與縣署皆為西向，[48]廟後為東。此官道自縣

41 此處之右營，指鎮標右營，在東安坊。參見王禮主修，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頁 70。

42 王禮主修，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頁 70；洪敏麟，《臺南市市區史蹟調查報告書》（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9），頁 22。

43 王禮主修，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頁 84；傅朝卿，《臺南市古蹟與歷史建築總覽》（臺南：臺灣建築與文化資產出版社，2001），頁 79。

44 王禮主修，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頁 70；不著撰人，《臺灣兵備手抄》，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22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頁 51；許雪姬，《清代臺灣的綠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頁 33-34。

45 連橫，《臺灣通史》，頁 475。

46 洪敏麟，《臺南市市區史蹟調查報告書》，頁 11。

47 康熙朝《臺灣縣志》文載：「縣署，在東安坊，西向。」乾隆前期《重修臺灣縣志》載：「縣口橋：在東安坊鎮標右營南舊縣署之前。」嘉慶年間《續修臺灣縣志》則載：「縣署：……初縣舊署在東安坊，……乾隆初年，……尋復設鎮標右營於署之前。」故知當時縣署在鎮標右營之東南。參見王禮主修，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頁 70；魯鼎梅主修，王必昌總輯，陳輝等編纂，《重修臺灣縣志》，頁 99；薛志亮主修，謝金鑾、鄭兼才總纂，《續修臺灣縣志》，頁 88。

48 乾隆九年至十一年（1744-1746）任臺灣縣知縣之李閩權所撰的〈新修城隍廟前石道記〉載：「臺邑城隍廟在鎮北坊，……廟前沙礫之地，界近右營。」可知城隍廟面朝右營營盤側，故為西向。參見李閩權，〈新修城隍廟前石道記〉，見六十七、范咸纂輯，《重修臺灣府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0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 69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署之北、縣城隍廟之南轉繞廟後入永康里中營至萬壽亭一段，相對於縣署為向東北方位移。萬壽亭南向，[49]故官道乃自其西側通經。如此或得以推斷，萬壽亭和中營座落於臺灣縣舊縣署之東北象限範圍內，且萬壽亭可能在中營的東北方，至於萬壽亭與總鎮署間的南北相對位置則難自圖上明確論斷。

〈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完成在雍正年間，此圖繪製的透視方法類同於《臺灣縣志》所附輿圖，全圖尺度的方位標定亦是左側朝北、右側朝南，絕大多數的聚落和地物設施以文字標註，呈現方式較為簡略，[50]圖幅內地物間的空間幾何關係仍有相當程度的扭曲。[51]此圖內容顯示，萬壽亭鄰近中營，兩者被標記在臺灣縣縣署的左上方（見圖三），相對方位應是東北，與《臺灣縣志》所附輿圖顯示的空間資訊相同。「萬壽亭」三字直書於「中營」兩字右上方，前者似在後者東南側，但考量散點透視的特徵，對照臺灣府（署）和城隍廟兩處相鄰建築的中心點為東北－西南之相對方位關係，圖中註記文字則作右上方－左下方之配置；關帝廟（祀典武廟）與媽祖宮（大天后宮）東西相鄰，註記文字的配置亦如上述方式，加之本圖多數地物缺乏圖案輔助標示點位，故吾人或許得以基於該圖西前東後的整體觀景方向，從文字標記縱深上的差異研判萬壽亭應居中營以東，惟不易確認兩地在南北走向上之相對位置。

今日中營地名已未存續使用，其地理位置待後論考。就上述圖文資訊雖難明確定位萬壽亭初址，卻也足以揭示亭址的可能範圍在舊臺灣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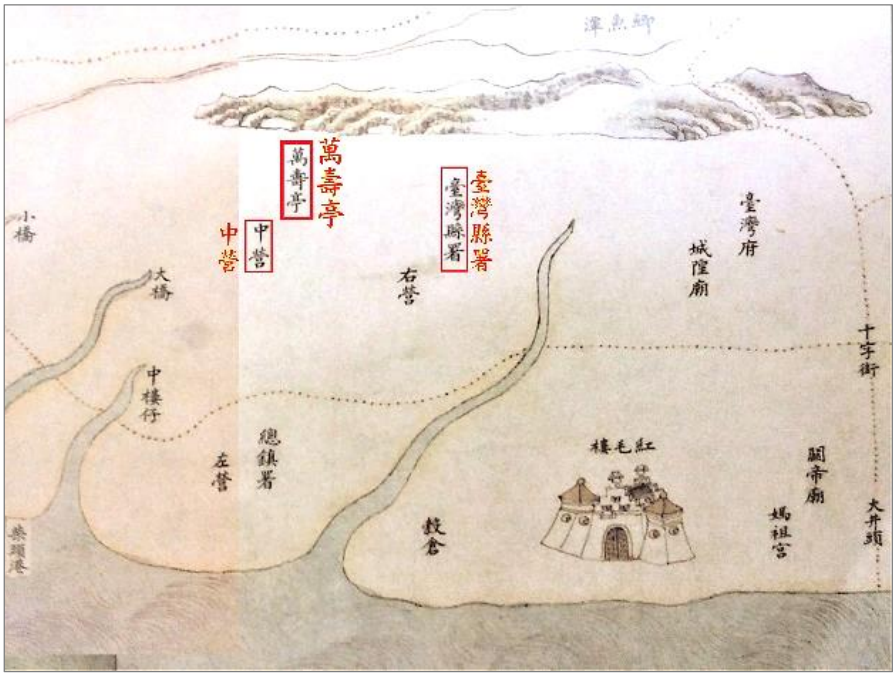
49 梁文科所撰〈重修萬壽亭碑記〉有載：「於午門之外，闢東闕、西闕，……東樹敷文門、西樹振武門、南面高築覓臺，以肅巨觀。」《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亦提及：「臺廈道陳璸，乃擇地於永康里建萬壽亭。前立午門，旁列朝房。」午門之名，乃得自於其居正南的午位。參見梁文科，〈重修萬壽亭碑記〉，頁 255；劉良璧纂輯，《重修福建臺灣府志》，頁 249。

50 不著繪人，〈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51 例如大橋應在臺灣縣舊縣署（約今臺南車站西南側）之東北方，圖中呈現則在左下方的西北象限範圍內。按：大橋約今永康區西橋里域。參見翁佳音，〈大橋的故事〉，《歷史月刊》第 230 期（2007 年 3 月，臺北），頁 3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署東北象限，與初址位於舊臺灣縣署東南象限的成功大學勝利校區南側的現傳說法並不相同。



圖三　清雍正年間〈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局部）

資料來源：改繪自不著繪人，〈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

（二）乾隆朝以降

臺灣納入清國版圖後，行政上劃歸福建省轄理，設置臺灣府，初領臺灣、諸羅和鳳山三縣，以臺灣縣為附郭縣。初期官方曾規劃於永康里之地建臺灣府城池，卻因故遲未興築。[52]康熙六十一年（1722）歲次壬

52 《臺灣府志》中記載：「府城：卜在永康里。未築。附郭：臺灣縣。」《臺海使槎錄》、《重修臺灣府志》、《臺海見聞錄》和《續修臺灣府志》中俱載：「臺地初闢，原卜築城於永康里，後不行。」參見高拱乾纂輯，《臺灣府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6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 27；黃叔璥，《臺海使槎錄》，收入《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寅，福建水師提督姚堂（?-1723）鑒於朱一貴事件時郡治無城可守，以致快速淪陷，因此奏請開捐建臺灣城，但仍不得果行。[53]嗣後，巡臺御史禪濟布請用木柵建築臺灣城獲允，[54]並由巡道吳昌祚責令臺灣縣知縣周鍾瑄（1671-1763）總理相關事宜。[55]

在乾隆朝出版的《重修臺灣府志》（刊成於乾隆十二年〔1747〕）、《重修臺灣縣志》（刊成於乾隆十七年〔1752〕）、《臺海見聞錄》（刊成於乾隆十八年）和《續修臺灣府志》（刊成於乾隆二十八年〔1763〕）中，提及康熙末年郡治居民意欲仿照鳳山、諸羅兩縣之例，圍築土牆，牆帶分布議由下林仔起，經土墼埕、鬼子山、春牛埔、上帝廟坑、中營埔、萬壽寺、中樓仔、北教場至北海尾，屏障南、東、北三面。[56]

嘉慶十二年（1807）成書的《續修臺灣縣志》內，對於周鍾瑄所築木柵之分布有如下記載：

> 縣故無城，雍正元年，邑宰周鍾瑄始創木柵，建七門焉。正東倚龍山寺，為大東門。柵自大東門而南，內抱山川壇，亙東南為小南門，度正南拱府學文廟前為大南門；迤西內控土墼埕，外逼下林仔，北折跨溝為水門，至渡船頭而止。又自大東門而北，亙右營廳至東北為小東門；正北內邇城守營為大北門；西北內逼烏鬼井為小北門；迤西外逼船廠，南折跨溝為水門，過媽祖樓之西終焉。柵周二千六

灣文獻叢刊》第 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頁 18；六十七、范咸纂輯，《重修臺灣府志》，頁 59；董天工，《臺海見聞錄》，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29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 6；余文儀主修，《續修臺灣府志》，頁 61。

53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 18。

54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四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8），頁 54-55。

55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四輯）》，頁 295-296；石萬壽，《樂君甲子集》（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04），頁 174；詹伯望，《半月沈江話府城》（臺南：臺灣建築與文化資產出版社，2006），頁 20。

56 六十七、范咸纂輯，《重修臺灣府志》，頁 59；魯鼎梅主修，王必昌總輯，陳輝等編纂，《重修臺灣縣志》，頁 87-88；董天工，《臺海見聞錄》，頁 6；余文儀主修，《續修臺灣府志》，頁 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百六十二丈，獨缺其正西，仍為門以當其缺，曰大西門。[57]

上述兩時期古籍，對於擬建土垣和實築木柵所經地方的敘寫內容不同。

比對兩者的地名內容，「下林仔」也作「下林子」，大致指稱今南區新昌、廣州兩里地區；[58]「土墼埕」或名「塗墼埕」，其地約今中西區福安里南緣和小西里一帶；[59]「鬼子山」又雅稱「桂子山」、「魁斗山」，[60]係指位於今大南門外五妃廟、臺南市政府消防局第七大隊至水

57 薛志亮主修，謝金鑾、鄭兼才總纂，《續修臺灣縣志》，頁 6。按：關於臺灣城木柵興築年代，《清一統志臺灣府》內有不同的記載，其文云：「臺灣府城：本朝雍正三年，建柵城。」《宮中檔雍正朝奏摺》也呈現相同的資訊。參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一統志臺灣府》，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6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 4；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四輯）》，頁 54-55。

58 今新昌里內的建安宮、玉聖宮、廣州里內的碧龍宮、和心堂，在廟壇名稱之前習冠以「下林」二字。

59 乾隆年間臺灣知府蔣元樞建小西門於土墼埕西，城門臺基故址近現西門路一段、府前路口處。今位於福安里南緣的良皇宮被認為是清代方志中所稱的鳳山縣土墼埕保慈濟宮，而府前路上之昆沙宮（俗稱下太子宮），清領時原在軍裝局、今新光三越百貨大樓與大億麗緻酒店附近，《重修臺灣縣志》和《續修臺灣縣志》中記載其為土墼埕尾下太子宮。自上推知，土墼埕約指今福安里南緣與小西里一帶。參見高拱乾纂輯，《臺灣府志》，頁 221；陳璸、周元文纂輯，《重修臺灣府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6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 281；李丕煜主修、陳文達等編纂，《鳳山縣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2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 161；魯鼎梅主修，王必昌總輯，陳輝等編纂，《重修臺灣縣志》，頁 202；薛志亮主修，謝金鑾、鄭兼才總纂，《續修臺灣縣志》，頁 341；陳國瑛等採輯，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采訪冊》，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5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頁 24；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通志》，頁 631；洪敏麟，《臺南市市區史蹟調查報告書》，頁 22；謝奇峰，《臺南府城聯境組織研究》（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3），頁 257。

60 《臺灣志略》載：「五妃墓，在仁和里魁斗山。」《臺灣縣志》亦載：「義塚，在寧南坊魁斗山；俗名鬼仔山是也。」桂子山則是鬼子山的近音雅稱。參見李元春，《臺灣志略》，頁 44；王禮主修，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頁 95；施添福總編纂，王世慶編纂，許淑娟等撰述，《臺灣地名辭書（卷廿一）——臺南市》，頁 174；陳鈴琴，〈死生之境：台南南郊竹溪沿岸墳場地景之文化與構成分析〉（嘉義：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頁 14-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交社間的沙丘，[61]而大南門座落樹林街二段、南門路口西北側，即「土墼埕」之東、「鬼子山」與文廟之間；「春牛埔」在東門路的大東門遺址附近，[62]因是昔日舉辦迎春牛儀式之場域而得名，[63]康熙晚期民建龍山寺於此（東門外街）。[64]「春牛埔」和大南門一線之中段、鄰近樹林街二段、開山路口處為小南門遺址；[65]「春牛埔」之西北西側、小南門之東北方有「山川臺」，現為東門圓環，舊設風雲雨雷壇，[66]即「山川壇」。如此，大東門以西之南面木柵大致循行「下林仔」、「土墼埕」、「鬼子山」、「春牛埔」附近地區布建，迨無疑義。

舊志記載，臺灣縣永康里內有「中樓仔街」，[67]據考證此街市在燕

61 戴文鋒，〈臺灣民間有應公信仰考實〉，《臺灣風物》第 46 卷第 4 期（1996 年 12 月，臺北），頁 57；黃中明，〈日治地形圖在城市高程探討的應用——以臺南竹溪墳場為例〉，收入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編，《2015 臺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立臺南大學，2015），頁 97-98。

62《臺灣采訪冊》載：「臺郡大東門外春牛埔閒曠地，凡白糖行碾碎及舊污泥多遺棄其間。」《鳳山縣采訪冊》載：「先農廟，在東門外春牛埔。」《清世宗實錄選輯》載：「雍正十三年（乙卯）春三月初八日（戊寅），兵部議覆：『福建總督郝玉麟疏言「臺灣府城東南大東門內春牛埔，請添設一營」，……應如所請。』」由上文知春牛埔乃大東門內、外鄰地。參見陳國瑛等採輯，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采訪冊》，頁 44；盧德嘉纂輯，《鳳山縣采訪冊》，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7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 165；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世宗實錄選輯》，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6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頁 51。

63《安平縣雜記》有載：「文官，立春前一日，府縣經捕廳應各穿朝衣、朝裙，戴朝帽，坐憲司轎，到大東門外春牛埔，拜芒神、春牛……。」參見不著撰人，《安平縣雜記》，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5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頁 18。

64 李亦興，《臺灣的龍山寺》（臺北：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頁 28。按：原東門外街之龍山寺，經日治昭和二年（1927）、七年（1932）兩次拓寬馬路，拆遷至東門路二段現址。參見傅朝卿，《臺南市古蹟與歷史建築總覽》，頁 146。

65 洪敏麟，《臺南市市區史蹟調查報告書》，頁 11。按：樹林街二段、開山路口西南側、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小學旁之人行道上立有小南門遺址碑。

66 施添福總編纂，王世慶編纂，許淑娟等撰述，《臺灣地名辭書（卷廿一）——臺南市》，頁 319。

67 王禮主修，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頁 92；劉良璧纂輯，《重修福建臺灣府志》，頁 84；余文儀主修，《續修臺灣府志》，頁 8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潭之東、今成功大學力行校區一帶，[68]「中樓」地名迄今尚留存於北區中樓里。[69]中樓里西南方、北門路二段、小東路口處為大北門遺址，[70]大北門之南昔有城守營。[71]「北教場」係大北門外較場，約是目前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以下簡稱臺南二中）校地及其北側地帶，[72]日治初期仍作練兵場之用，[73]其東即中樓里。「北海尾」所在難以詳稽，酌量「海尾」的名稱，應為較場以西、德慶溪入海口處之台江內海沿岸，筆者臆斷極可能是《續修臺灣縣志》記載的「船廠」周邊，現臺南市北區立人

68 石萬壽，〈王爺信仰與延平王君臣關係之探討〉，《臺灣文獻》第 60 卷第 1 期（2009 年 3 月，南投），頁 225。

69 日明治三十七年出版的《臺灣堡圖》，今西部縱貫線鐵路以東、勝利路以西、小東路以北的街廓地內標註有「中樓仔」地名，此範圍即目前中樓里之里境。《臺灣地名辭書（卷廿一）——臺南市》指出該地名原稱小東路西段之北，即現中樓里西南里域，後稱里境東北隅的開元路、勝利路口附近。清乾隆朝〈臺灣府汛塘圖〉、〈福建臺灣地理全圖〉將中樓仔標記於大北門、教場之左，距大北門明顯較遠，似涵指目前中樓里北方之地；〈乾隆臺灣輿圖〉則將其標註於教場之右上、大北門之上，距大北門較近，標示位置同於今日的中樓里。參見謝國興主編，林天人圖說編撰，《方輿搜覽——大英圖書館所藏中文歷史地圖》（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2015），頁 293；不著繪人，〈福建臺灣地理全圖〉（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不著繪人，〈乾隆臺灣輿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臺灣堡圖（下冊）》，頁 344、399；施添福總編纂，王世慶編纂，許淑娟等撰述，《臺灣地名辭書（卷廿一）——臺南市》，頁 284。

70 洪敏麟，《臺南市市區史蹟調查報告書》，頁 11。

71 清雍正十一年（1733）設立的城守營參府署，推定約在今北區富北路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附近。參見洪敏麟，《臺南市市區史蹟調查報告書》，頁 11。

72 《臺灣縣志》載：「教場：一在鎮北坊，鎮營操閱之所。」《重修臺灣府志》和《續修臺灣府志》則載：「鎮守臺澎掛印總兵官：……較場在北門外。」光緒元年（1875）福州船政學堂學生測繪的〈臺灣府城街道全圖〉上，總鎮署之東北方、大北門外有「較場」，日明治三十七年製作的《臺灣堡圖》上則標註為「練兵場」。參見王禮主修，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頁 114；六十七、范咸纂輯，《重修臺灣府志》，頁 311；余文儀主修，《續修臺灣府志》，頁 385；魏瀚等，〈臺灣府城並安平海口圖〉，收入謝國興總纂，《續修臺南市志（卷首）》（臺南：臺南市政府，1997），圖 0-0-5-2；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臺灣堡圖（下冊）》，頁 344。

73 臺灣總督府土木部，〈臺南市區改正計畫圖〉（臺北：臺灣總督府土木部，19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民小學西側。[74]雍正三年（1725），清廷於德慶溪入台江內海河口北岸建「軍工道廠」，以修造水師戰船；[75]道光五年（1825）再准設「軍工府廠」，[76]址在小西門外，[77]自此遂因相對位置之故而分別有「北廠」、「南廠」之稱。[78]德慶溪為府城右分水，位置居北，其出海口稱「北海尾」亦屬合理。「烏鬼井」（北區自強街 146 巷 10 號前）在「北廠」東北，今北區自強街一帶，舊名「水仔尾」北部，[79]井的東北方不及 500 公尺處、公園北路與西門路三段交會處南側則為小北門故址。[80]整體言之，臺灣舊志中對於康熙朝郡邑北面擬建城垣分布範圍的指稱，與雍正年間實築木柵沿經區帶的記述內容間未出現扞格之處。

「上帝廟坑」地名現已不存，前人研究有云為後火車站前窪地，[81]應即德慶溪上游谷地。「坑」一般意指山地或丘陵中的小坳谷，內有流水。[82]大東門「春牛埔」之北、今臺南一中與成功大學勝利校區交界一帶為德

74 洪敏麟，《臺南市市區史蹟調查報告書》，頁 22；石萬壽，〈臺南府城的城防〉，頁 163。

75 連橫，《臺灣通史》，頁 381。

76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戊集》，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79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2），頁 311-313。

77 李其霖，〈清代臺灣軍工戰船廠的興建〉，《淡江史學》第 14 期（2003 年 12 月，臺北），頁 208。

78 不著撰人，《安平縣雜記》，頁 82；洪敏麟，《臺南市市區史蹟調查報告書》，頁 22；范勝雄，〈「府城」西城故事〉，《臺灣文獻》第 43 卷第 4 期（1992 年 12 月，南投），頁 164。

79 「水仔尾」乃德慶溪末端之意，此地可能是荷、鄭時期台江內海海岸所在。「水仔尾」指稱區域原約為今日的自強街，後以德慶溪為界，北段稱大銃街，南段（自強街 41 號以南）稱水仔尾街。參見賴建銘，〈臺南郡城史話〉，《臺灣風物》第 23 卷第 2 期（1973 年 6 月，臺北），頁 38；范勝雄，《府城叢談——府城文獻研究（一）》（臺南：臺南市政府，1997），頁 56-57。施添福總編纂，王世慶編纂，許淑娟等撰述，《臺灣地名辭書（卷廿一）——臺南市》，頁 255-256；傅朝卿，《臺南市古蹟與歷史建築總覽》，頁 64。

80 洪敏麟，《臺南市市區史蹟調查報告書》，頁 11。

81 石萬壽，〈臺南府城的城防〉，頁 163、圖 1。

82 陳正祥，《臺灣地名辭典》（臺北：南天書局，1993），頁 36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慶溪溪谷源頭，極可能也在「上帝廟坑」的指稱範圍內。[83]「上帝廟坑」一名或與該溪中游流經東安坊大上帝廟（鷲嶺北極殿）附近有關，因此廟歷史「最為久遠」、[84]「高聳甲於他廟」，[85]且其周境曾形成「上帝廟街」的街市。[86]參照乾隆朝輿圖，右營廳（守備署）位置介於大東門和

83 清代臺灣方志中最早提及「德慶溪」者，應是乾隆十七年成書的《重修臺灣縣志》，文載德慶溪俗呼「坑仔底」，而「坑仔底」的地名記載最早則出現於乾隆六年（1741）出版的《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其云德行橋在坑仔底。就語意言之，前者的「坑仔底」應指河流實體；後者的「坑仔底」傾向指稱特定的空間點位，為今日民族路二段、中山路口附近，德行橋重修後稱德慶橋。此前，臺灣舊志內未能尋得「德慶溪」或「坑仔底」的名稱敘寫。「上帝廟坑」地名初見於乾隆十二年刊成之《重修臺灣府志》中有關府治土垣擬建地帶的行文間，文後註記引自〈赤崁筆談〉，《續修臺灣府志》和《臺海見聞錄》亦如是記載。〈赤崁筆談〉為康熙六十一年來臺御史黃叔璥所著，收入乾隆元年(1736)刊成的《臺海使槎錄》，但查對傳世之〈赤崁筆談〉內容，並無擬建牆垣沿經地區的地名說明。雖然如此，志書中「德慶溪」名稱的出現時序晚於「坑仔底」、「上帝廟坑」應無疑義。若言「上帝廟坑」曾作為德慶溪整體谷系或流域部分土地空間的地名使用，「坑仔底」的「坑」即「上帝廟坑」，其可能性並非不存。參見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 18-19；劉良璧纂輯，《重修福建臺灣府志》，頁 88；六十七、范咸纂輯，《重修臺灣府志》，頁 59；魯鼎梅主修，王必昌總輯，陳輝等編纂，《重修臺灣縣志》，頁 34；余文儀主修，《續修臺灣府志》，頁 61；董天工，《臺海見聞錄》，頁 6；薛志亮主修，謝金鑾、鄭兼才總纂，《續修臺灣縣志》，頁 12；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南部碑文集成》，頁 523；施添福總編纂，王世慶編纂，許淑娟等撰述，《臺灣地名辭書（卷廿一）——臺南市》，頁 148；劉益昌、許清保、吳建昇、郭俊欽，《台江國家公園及周緣地區人文歷史調查及保存規劃研究成果報告書》（臺南：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2011），頁 137。

84 高拱乾纂輯，《臺灣府志》，頁 219；陳璸、周元文纂輯，《重修臺灣府志》，頁 280；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通志》，頁 630。

85 王禮主修、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頁 208；劉良璧纂輯，《重修福建臺灣府志》，頁 306；王禮主修，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頁 208；六十七、范咸纂輯，《重修臺灣府志》，頁 546；余文儀主修，《續修臺灣府志》，頁 646。

86 《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中對於街市有載：「臺灣縣：……嶺後街（在東安坊）、枋橋頭街（在嶺後街下）、上帝廟街（在枋橋頭街下）……。」嶺後街約今中山路與青年路間之民權路一段，枋橋頭街大致為今臺南公會堂南的民權路段，後者位於前者之西。依府志記述，上帝廟街乃在枋橋頭街之西，應即大上帝廟附近。參見劉良璧纂輯，《重修福建臺灣府志》，頁 83；魏瀚等，〈臺灣府城並安平海口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德慶溪間，[87]應就屬「上帝廟坑」指稱的地境內。綜整上述資訊，自大東門向北，亙右營廳至小東門的東面木柵，即沿著舊稱「上帝廟坑」、中營埔和萬壽亭之地帶分布。又，歸結乾隆朝志書內對擬建城垣沿行空間的地名敘寫次序，乃以西南方為始，以西北方為終，依逆時針方向排列。由之進一步推論，萬壽亭和中營埔皆在德慶溪北岸，且前者甚可能位處後者以北、中樓仔以東之地。

在臺灣府圍築木柵城後，諸多志書或文籍述及萬壽亭空間位置時，出現了以城門為相對參考點的敘寫方式。《重修臺灣縣志》、《續修臺灣縣志》、《臺灣志略》、《臺灣采訪冊》、《欽定平定臺灣紀略》等書籍文字內容，或記載陳璸倡捐的萬壽亭（亦有作萬壽寺）「在小東門外永康里北」、[88]德慶溪源出「小東門外萬壽寺（亦有作舊萬壽宮）前」、[89]靈濟井「在小東門外萬壽寺（亦有作萬壽宮）後」、[90]抑或記載林爽文事件發生之際守禦兵員「駐箚小東門外舊萬壽亭」。[91]據此推知，城柵各門之中可能是以小東門的位置最為鄰近萬壽亭。

製作於乾隆朝之《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刊成於乾隆六年）所附〈臺灣縣圖〉、《重修臺灣府志》（刊成於乾隆十二年）所附〈臺灣縣圖〉、〈臺灣府汛塘圖〉（成圖年代被推定在雍正十二年至乾隆二十四年〔1734-1759〕間）、[92]〈福建臺灣地理全圖〉（可能完成於乾隆二十八年）[93]

87 〈福建臺灣地理全圖〉和〈乾隆臺灣輿圖〉上，在大東門與德慶溪間的城柵內分別標記有「右廳衙」和「右營守備」。參見不著繪人，〈福建臺灣地理全圖〉；不著繪人，〈乾隆臺灣輿圖〉。

88 魯鼎梅主修，王必昌總輯，陳輝等編纂，《重修臺灣縣志》，頁 193；薛志亮主修，謝金鑾、鄭兼才總纂，《續修臺灣縣志》，頁 343。

89 魯鼎梅主修，王必昌總輯，陳輝等編纂，《重修臺灣縣志》，頁 34；薛志亮主修，謝金鑾、鄭兼才總纂，《續修臺灣縣志》，頁 22；李元春，《臺灣志略》，頁 9；陳國瑛等採輯，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采訪冊》，頁 11。

90 魯鼎梅主修，王必昌總輯，陳輝等編纂，《重修臺灣縣志》，頁 536；薛志亮主修，謝金鑾、鄭兼才總纂，《續修臺灣縣志》，頁 12。

91 不著撰人，《欽定平定臺灣紀略》，頁 313。

92 謝國興主編，林天人圖說編撰，《方輿搜覽》，頁 29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和〈乾隆臺灣輿圖〉（推定應完成於乾隆朝中葉）[94]等 5 幅古地圖（圖四至圖八）中，標繪有萬壽亭。[95]





（左）圖四　清乾隆年間《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灣縣圖〉（局部）

資料來源：改繪自劉良璧纂輯，《重修福建臺灣府志》，福建臺灣全圖頁 5。

（右）圖五　清乾隆年間《重修臺灣府志》〈臺灣縣圖〉（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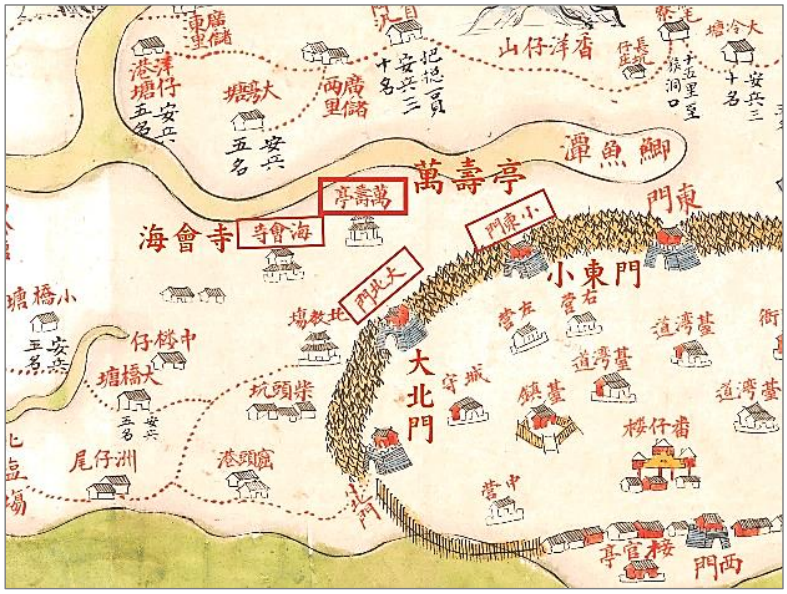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改繪自六十七、范咸纂輯，《重修臺灣府志》，福建臺灣全圖頁 5。

93 關於〈福建臺灣地理全圖〉製作年代，圖面上有乾隆二十八年題簽之資訊。參見梁二平，《中國古代海洋地圖舉要》（北京：海洋出版社，2011），頁 216。

94 〈乾隆臺灣輿圖〉製作年代後世推定不一，然可稱在乾隆朝中期。參見洪英聖，〈康熙、乾隆「臺灣輿圖」的聚落發展〉，《弘光人文社會學報》第 13 期（2010 年 11 月，臺中），頁 9-10。

95 〈福建臺灣地理全圖〉上無萬壽亭的文字標記，但中營左上方繪有一個建築圖案，座北朝南，建物組成與萬壽亭具有的午門、二層龍亭、祝聖殿或僧舍、牆垣、東、西二門幾能對應，可斷為萬壽亭。參見不著繪人，〈福建臺灣地理全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六　清乾隆年間〈臺灣府汛塘圖〉（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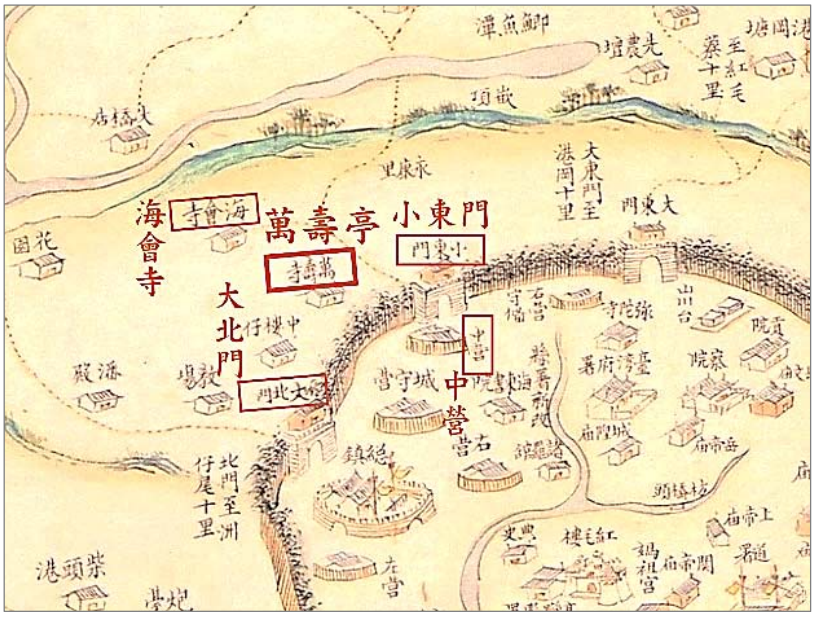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改繪自謝國興主編，林天人圖說編撰，《方輿搜覽》，頁 293。



圖七　清乾隆年間〈福建臺灣地理全圖〉（局部）

資料來源：改繪自不著繪人，〈福建臺灣地理全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八　清乾隆年間〈乾隆臺灣輿圖〉（局部）

資料來源：改繪自不著繪人，〈乾隆臺灣輿圖〉。

上列諸圖亦採山水畫技法完成，全圖尺度的方位同為左北、右南、上東、下西，同樣存在散點透視繪製法所產生的空間幾何關係扭曲現象，惟因畫出城柵，加上部分輿圖資訊記載益趨豐實，可作為空間參考基準的地標數量增加，是以小範圍尺度內地物之定位與相對位置呈現的正確性，平均而言較前期地圖有所提升，其中〈乾隆臺灣輿圖〉（圖八）更被認為是清代臺灣地圖史上的經典作品，所傳遞之總體資訊的質量最為傑出。[96]對照之下，〈臺灣府汛塘圖〉（圖六）上的地物標註內容品質較低，[97]另就此圖臺鎮署與鎮標中、左、右、城守等四營彼此間的相對

96 夏黎明，〈國家統治與知識生產：清代台灣地圖的繪製與區域發展〉，《興大歷史學報》第 15 期（2004 年 10 月，臺中），頁 43-44。

97 例如中營與左營位置誤植，應予互調；臺鎮左上方的臺灣道為臺灣縣所在，東門下方的臺灣道為臺灣府所在。參見謝國興主編，林天人圖說編撰，《方輿搜覽》，頁 29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位置來看，其空間幾何關係的扭曲亦較其他輿圖顯著。[98]

上述輿圖的資訊顯示，中營公署應位於小東門西北側木柵城內，而萬壽亭在中營公署之東北方、小東門之北方至東北方範圍間。[99]

〈福建臺灣地理全圖〉、〈乾隆臺灣輿圖〉和〈臺灣府汛塘圖〉三圖中並標繪出海會寺。由圖七、圖八得以發現，萬壽亭位處小東門出往海會寺的道路中途，基址點位應落在小東門、海會寺、大北門連成之三角形地帶內。圖六萬壽亭標繪於海會寺之右上方，不在前述的三角形範圍中，惟該圖的空間幾何關係扭曲較為明顯，其呈現的相對位置資訊內涵是否實異於其他兩圖，不易商榷；而圖資品質較佳之〈乾隆臺灣輿圖〉（圖八）另顯示，萬壽亭與城外的海會寺、城內的中營公署近乎呈現在同一條透視直線上排列，其西半側有中樓仔聚落。

〈臺灣里堡圖〉的成圖時間被推定為嘉慶二十四年至道光九年（1819-1829）間，[100]其繪製型態和方位系統呈現同於前期輿圖，但空間幾何關係的扭曲現象卻較乾隆時期多數輿圖來得顯著。[101]圖上中營之標記往西移置，接近臺灣鎮營盤，與前期輿圖不同。由小東門向左上方通往開元寺間標有一條路徑，萬壽亭係以文字標記於此道路旁，亭址點位亦落在小東門、海會寺、大北門間的三角形地帶中（圖九）。[102]

98 例如城守營與左營（圖中誤植為中營）各應在大北門和小北門之東，但圖上的相對位置呈現與全圖上東下西的空間定位顯著不一致。參見謝國興主編，林天人圖說編撰，《方輿搜覽》，頁 293。

99 劉良璧纂輯，《重修福建臺灣府志》，福建臺灣全圖頁 5；六十七、范咸纂輯，《重修臺灣府志》，福建臺灣全圖頁 5；不著繪人，〈福建臺灣地理全圖〉；不著繪人，〈乾隆臺灣輿圖〉；謝國興主編，林天人圖說編撰，《方輿搜覽》，頁 293。

100 謝國興主編，林天人圖說編撰，《方輿搜覽》，頁 64。

101 例如當時之臺灣縣署近大西門，圖中其乃近小北門；而應近大北門之城守營，於圖內近小東門，其應位於右營之北，但在圖面呈現上繪製於右營之上方，城守營之標示或有訛誤。參見謝國興主編，林天人圖說編撰，《方輿搜覽》，頁 69；薛志亮主修，謝金鑾、鄭兼才總纂，《續修臺灣縣志》，頁 6、250；陳國瑛等採輯，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采訪冊》，頁 23。

102 謝國興主編，林天人圖說編撰，《方輿搜覽》，頁 6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九　清嘉慶至道光年間〈臺灣里堡圖〉（局部）

資料來源：改繪自謝國興主編，林天人圖說編撰，《方輿搜覽》，頁 69。

小東門城垣殘蹟現址在成功大學光復校區舊文學館正東方之勝利路邊；[103]海會寺即今日的開元寺，座落北區的北園街上，原為東寧時期北園別館之地。[104]清初建立的臺灣鎮標中營，於乾隆四十三年（1778）蔣元樞離任臺灣府知府前被移建至東安上坊內。[105]先此以往，舊志內對其

103 石萬壽，《樂君甲子集》，頁 174、246。

104 王禮主修，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頁 212；劉良璧纂輯，《重修福建臺灣府志》，頁 466；六十七、范咸纂輯，《重修臺灣府志》，頁 544-545；魯鼎梅主修，王必昌總輯，陳輝等編纂，《重修臺灣縣志》，頁 194；薛志亮主修，謝金鑾、鄭兼才總纂，《續修臺灣縣志》，頁 342；余文儀主修，《續修臺灣府志》，頁 645；陳壽祺總纂，魏敬中纂修，《福建通志臺灣府》，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8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 889；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一統志臺灣府》，頁 32；石萬壽，《樂君甲子集》，頁 218-219。

105 《重修臺灣各建築圖說》〈移建中營衙署圖說〉內載及：「臺灣中營衙署，原建在郡城永康里。……元樞因即會營熟籌，就東安上坊隙地，將舊署移建；……一切應需工料，俱由元樞與劉遊擊（潢）捐備。」中營遊擊劉潢係乾隆四十三年就任，而蔣元樞於同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位置之敘述多略以「在永康里」。[106]前人研究指出，中營或中營埔之地處在縱貫線鐵路以東至開元路間，[107]今北區勝安里境，乃屬城外。然而，依據前列輿圖上中營被繪記於城內，鄰近小東門北側木城柵旁，且地居臺灣縣舊縣署以東的資訊研判，[108]當時臺灣鎮標中營營盤暨其公署應座落府城城區東北角、目前的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內為是。[109]

康熙末年朱一貴事變平定後，清廷感知府城防禦增強的必要性，遂於雍正時期興建木城柵以為因應；而考量維持治安之便，且將德慶溪東

知府任滿離職，中營衙署移建時間應在該年。參見蔣元樞，《重修臺灣各建築圖說》，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28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0），頁 73；薛志亮主修，謝金鑾、鄭兼才總纂，《續修臺灣縣志》，頁 131、264。

106 高拱乾纂輯，《臺灣府志》，頁 65；陳璸、周元文纂輯，《重修臺灣府志》，頁 32、91；王禮主修，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頁 70、72；魯鼎梅主修，王必昌總輯，陳輝等編纂，《重修臺灣縣志》，頁 95；劉良璧纂輯，《重修福建臺灣府志》，頁 343；六十七、范咸纂輯，《重修臺灣府志》，頁 311；余文儀主修，《續修臺灣府志》，頁 385。按：鎮標中營衙署於蔣元樞知府任內移建東安上坊，但成書在嘉慶年間的《續修臺灣縣志》與道光年間的《福建通志臺灣府》俱記載中營署在永康里，而《續修臺灣縣志》所附臺灣縣輿圖上的中營位置標示在右營之西，屬東安坊，其間出入或因文字沿抄舊志所致，有待詳考。參見蔣元樞，《重修臺灣各建築圖說》，頁 73；薛志亮主修，謝金鑾、鄭兼才總纂，《續修臺灣縣志》，頁 5、251；陳壽祺總纂，魏敬中纂修，《福建通志臺灣府》，頁 99。

107 石萬壽，〈臺南府城的城防〉，頁 163、圖 1-圖 2。

108 乾隆十五年（1750），臺灣知縣魯鼎梅移建臺灣縣署至鎮北坊赤嵌樓之右，後東安坊廢署被修為海東書院，故〈福建臺灣地理全圖〉和〈乾隆臺灣輿圖〉上的東安坊內分別有「舊縣衙」與「海東書院」、「縣署新改」之標示文字。參見薛志亮主修，謝金鑾、鄭兼才總纂，《續修臺灣縣志》，頁 88、166；不著繪人，〈乾隆臺灣輿圖〉；不著繪人，〈福建臺灣地理全圖〉。

109 府城四坊是以人口集居區塊的相對方位進行劃分，無涉於城牆。垣廓形成後，坊里和四坊的區劃方轉為以街道和城牆作為界定的依憑。同治年間刊行的《臺灣府輿圖纂要》載：「永康下里：城東一里起，莊十八（建城後，有收入城內者）。」若小東門以北的成功大學光復校區為清初中營營盤所在，原屬永康里，後被圍入城內，改歸為坊內的一部分，其屬合理。參見不著撰人，《臺灣府輿圖纂要》，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8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頁 10；黃蘭翔，〈臺南十字街空間結構與其在日據初期的轉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19 期（1995 年 6 月，臺北），頁 41-43、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北面的營盤圍入城內，城廓範圍東至崁頂山麓，北抵燕潭，[110]府治界址自此明確化，臺灣鎮標中營被含納其中。乾隆年間中營營盤西遷，原據土地空間或有部分閒置；迨同治十三年（1874），官府於小東門內擇選空地建軍裝局火藥庫，[111]筆者臆斷應即中營舊地。查對既有文獻內容、光緒元年（1875）〈臺灣府城並安平海口圖〉與日明治二十九年（1896）〈臺南府迅速測圖（臺南市街圖）〉顯示的地理資訊，上述火藥庫（臺郡軍裝局）位置乃今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北部的成功湖附近，湖之東南係小東門遺址。[112]日治初期，成大光復校區北部由臺南守備混成旅團的騎兵中隊使用，[113]之後則作為臺灣步兵第二聯隊營區（圖十）。[114]二次大戰結束，步兵第二聯隊營區為國民政府接收，改稱陸軍臺南光復營區，係軍部駐在。[115]該地具有延續性的軍事功能土地利用變遷脈絡，亦提供了其可能曾是清初中營營盤的間接佐證。

歸納上述文書圖籍中萬壽亭位置的描述、記載內容和輿圖判讀結果的共同特徵，筆者進一步推估萬壽亭極可能位於現成大光復校區向東北至開元寺一線之間，其基址點位座落小東門、開元寺、大北門三地間的土地區塊內。

---

110 范勝雄，《府城叢談——府城文獻研究（三）》，頁 50；范勝雄，〈臺南市區里變革初探〉，《臺灣文獻》第 34 卷第 3 期（1983 年 9 月，南投），頁 23。

111 沈葆楨（1820-1879）任臺灣海防欽差大臣時之奏片載：「又臺地向無軍裝火藥局，……因於小東門內擇出空地，委員同洋匠按照洋式起造火藥局一所。」參見沈葆楨，《福建臺灣奏摺》，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29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頁 37。

112 魏瀚等，〈臺灣府城並安平海口圖〉；石岡豬四郎等，〈臺南府迅速測圖（臺南市街圖）〉，收入謝國興總纂，《續修臺南市志（卷首）》，圖 0-0-5-8；詹伯望，《半月沈江話府城》，頁 67。

113 〈臺南迅速測圖〉內標註為「騎兵第三中隊」。參見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編，《縱覽台江——大員四百年地輿圖（增訂初版）》（臺南：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2012），頁 132。

114 黑田菊之助，〈臺南市全圖〉（臺南：黑田書店，1915）。

115 傅朝卿，〈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的歷史建構——從軍事到高等教育之空間演進〉，收入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編，《成功的道路——第一屆成功大學校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立成功大學，2002），頁 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十　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土地利用變遷

資料來源：改繪自魏瀚等，〈臺灣府城並安平海口圖〉；石岡豬四郎等，〈臺南府迅速測圖（臺南市街圖）〉；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編，《縱覽台江》，頁 132；黑田菊之助，〈臺南市全圖〉；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灣百年歷史地圖——臺南市百年歷史地圖》(2016)，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ainan.aspx（2018 年 3 月 31 日檢索）。

乾隆朝的文獻中，另出現相關於萬壽亭的道里敘寫。《重修臺灣縣志》載萬壽亭「距城東門外約三里許」；[116]乾隆中期臺灣府知府蔣允焄為新建萬壽宮所撰著之碑記，也言及舊萬壽亭「距城三里許」；[117]《欽

116 魯鼎梅主修，王必昌總輯，陳輝等編纂，《重修臺灣縣志》，頁 193-194。

117 蔣允焄，〈新建萬壽宮碑記〉，收入薛志亮主修，謝金鑾、鄭兼才總纂，《續修臺灣縣志》，頁 49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定平定臺灣紀略》則稱舊萬壽亭「離城五里」，[118]計數不同於前兩者。當時道里量度方法、基準點和依循的路徑未能確知，由於〈乾隆臺灣輿圖〉和〈福建臺灣地理全圖〉上萬壽亭繪置在小東門往海會寺（開元寺）道旁，本文遂就之為前提，梳理舊籍內對海會寺相對距離的記述俾行比較論證。此間有云海會寺在「府治北六里許」、[119]或「距邑治四、五里許」、[120]在「郡北關外或北門外五里許」、[121]「臺灣縣治北五里」、[122]「距大北門三里」、[123]「郡城東去二里許」，[124]不一而足。今採清末營造尺 1 尺等於 0.32 公尺換算，[125] 1 里為 1800 尺，合公制係 576 公尺，以點間直線距離進行估測。海會寺至城垣各門間以小東門、大北門兩者為近，均約莫 1.4 公里，即略少於 2 里半；經小東門、大北門迄臺灣府署舊址間，分別為 2.6 公里和 2.5 公里；[126]經前列兩城門抵臺灣縣署舊址間，各約 2.9 公里與 2.5 公里，[127]折計不短於 5 里或 4 里。由此大致推斷，海會寺「郡城東去二里許」之說，應是從小東門或大北門處計量；記載 4 里至 6 里者，其度測基準或許非相對於城門言之，而是城內的臺灣府署或臺灣縣署。海會寺位置較萬壽亭遠離小東門，若海會寺距小東門 2 里許屬實，則萬壽亭距城 3 里、5 里之數係以小東門為計測基

118 不著撰人，《欽定平定臺灣紀略》，頁 150、313。

119 高拱乾纂輯，《臺灣府志》，頁 219；吳桭臣，〈閩遊偶記〉，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輿地彙鈔》，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21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頁 19；陳璸、周元文纂輯，《重修臺灣府志》，頁 279；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通志》，頁 630。

120 王禮主修，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頁 212。

121 董天工，《臺海見聞錄》，頁 8；蔣元樞，《重修臺灣各建築圖說》，頁 7。

122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一統志臺灣府》，頁 32。

123 連橫，《臺灣通史》，頁 587。

124 魯鼎梅主修，王必昌總輯，陳輝等編纂，《重修臺灣縣志》，頁 196。

125 吳洛，《中國度量衡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頁 337。

126 臺灣府署舊址在今府城隍廟東北、武德街一帶。參見洪敏麟，《臺南市市區史蹟調查報告書》，頁 21。

127 臺灣縣署原在東安坊，乾隆十五年移到鎮北坊，即今成功國小一帶。「海會寺在『臺灣縣治北五里』」見於嘉慶年間之記載（《清一統志臺灣府》），故此處臺灣縣署舊址乃定位於成功國小。參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一統志臺灣府》，頁 32；洪敏麟，《臺南市市區史蹟調查報告書》，頁 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準的合理性便有待商榷。[128]

基於上述討論，萬壽亭與海會寺間之道里差距，概約得以 1 里至 2 里（576-1152 公尺）計算。[129]綜整此項資訊與前列推繹所得，筆者研判康熙年間巡道陳璸興建的萬壽亭初址係在北區仁愛里西部之東豐路一帶，即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及其北側之區塊範圍內（圖十一）。



圖十一　清代萬壽亭初址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128 《重修臺灣縣志》有關萬壽亭「距城東門外約三里許」的記述，若考量該處行文前已先揭示該亭在小東門外、永康里北，則文中所稱「東門」應指小東門。然出小東門可至、路程更遠的海會寺，在同書中被記載為「距城二里許」，如此則其間乃存有扞格。參見魯鼎梅主修，王必昌總輯，陳輝等編纂，《重修臺灣縣志》，頁 193-194、196。

129 海會寺距離臺灣府城小東門最短距離約 2 里半，假設萬壽亭與海會寺同循出小東門外之一條路線可至，但相距大於 2 里半，則其位置將落在城垣之內，不合事實，故估計兩者相對距離取 1 里至 2 里為度。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萬壽亭地緣關係的探討

（一）萬壽亭與先農壇

清雍正五年（1727），臺灣縣知縣張廷琰奉旨新建先農壇於東郊長興里，壇前置耤田四畝九分。每年仲春吉期，各官員齊集先農壇舉行耕耤禮。依祭祀儀章，例由巡臺御史擔任正獻官。[130]

乾隆十九年（1754），臺灣縣知縣章士鳳改奉先農神牌於萬壽寺內，且將原在大東門外郊舉行的迎春典禮移至北郊辦理。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臺灣府知府覺羅四明（1716-?）諭令迎春禮改回東郊舉行，[131]但先農神位並未隨此異動。乾隆後期臺灣府知府蔣元樞重修先農壇，在其撰著的〈重修臺郡先農壇圖說〉中載及：

> 查臺郡先農壇自雍正年間奉詔恭建壇宇，規模雖具，歲久俱就傾圮。……從前，繚垣之內，僅建一壇；壇之北，設有八角小亭一座，以奉先農神牌。……謹按壇制，重加修飾；周圍墻垣，亦行塗堊。其奉先農神牌之八角亭，新為建蓋，視舊加崇。[132]

文後附〈靈濟泉說〉，其言：

> 八角亭之北隅，向有小屋數楹，供大士像；屋久傾圮。茲亦虔加修

130 魯鼎梅主修，王必昌總輯，陳輝等編纂，《重修臺灣縣志》，頁 208、212。

131 余文儀主修，《續修臺灣府志》，頁 313。

132 蔣元樞，《重修臺灣各建築圖說》，頁 55。按：〈重修臺郡先農壇圖說〉另有云：「而臺郡耕耤舊未置田，僅就壇外平原舉推耒耜；……臺郡勸農之禮向未舉行，亦乖政體。」《重修臺灣縣志》和《續修臺灣縣志》皆載張廷琰所建先農壇前耤田四畝九分，且乾隆初年巡臺御史楊二酉、張湄、書山共作有〈東郊勸農〉（二首）、〈勸農次書給諫韻〉、〈勸農歸路經海會寺次韻〉、〈勸農歸路經海會寺與諸同人分賦〉等與勸農相關之詩賦傳世。〈重修臺郡先農壇圖說〉所言臺郡舊未置耤田、未行勸農，其理可釋者，或指先農壇遷改至舊萬壽亭址後的情況。參見劉良璧纂輯，《重修福建臺灣府志》，頁 592、595-597；六十七、范咸纂輯，《重修臺灣府志》，頁 765-766、768-769；魯鼎梅主修，王必昌總輯，陳輝等編纂，《重修臺灣縣志》，頁 165；蔣元樞，《重修臺灣各建築圖說》，頁 55；薛志亮主修，謝金鑾、鄭兼才總纂，《續修臺灣縣志》，頁 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茸，以還其舊。屋後有井，屓泉也。康熙辛丑六月，提督藍公廷勳朱寇，駐師於此；三軍就汲，泉忽濆湧。因名之曰「靈濟」，並作歌勒石以記其事。今樞復建小亭一座，更以誌靈異於□……（闕數字）。[133]

靈濟泉井及相涉事物現俱已失沒，[134]遺跡不存。按上文所述，先農壇八角亭北側屋後為靈濟泉井，舊志又記靈濟泉在舊萬壽亭後。[135]由此可證，蔣元樞重修的先農壇乃位於萬壽亭舊址，應是章士鳳移祀先農神位後而成者。

乾隆三十九年（1774）《續修臺灣府志》所附〈臺灣縣圖〉（圖十二）和其後完成之《重修臺灣各建築圖說》〈臺灣郡城圖〉（圖十三）中，先農壇均標記於小東門外、中營東北方的城郊，[136]與前述《重修福建臺灣府志》所附〈臺灣縣圖〉、《重修臺灣府志》所附〈臺灣縣圖〉、〈福建臺灣地理全圖〉、〈乾隆臺灣輿圖〉等乾隆朝前期輿圖內萬壽亭的標示位置幾無二致，未見其間具有顯著出入，而〈福建臺灣地理全圖〉和〈乾隆臺灣輿圖〉兩幅圖內，先農壇則是標示在崁頂山以東的鯽魚潭附近，乃雍正年間初建之址（參圖七、圖八）。

此外，〈臺灣郡城圖〉上德慶溪係自城柵外東郊丘巒往下游方向圖繪，經大、小東門之間入郡邑，東面城柵跨德慶溪處（約今勝利路 103 號南側巷口附近）之北，畫有敵樓一座，有別於本文舉列的其他輿圖。此特徵更為明確地提供了一項可資研判的空間資訊，即奠立於舊萬壽亭址的先農壇未鄰近城外德慶溪上游段和小東門南敵樓東緣，其應非在今日成功大學勝利校區範圍內。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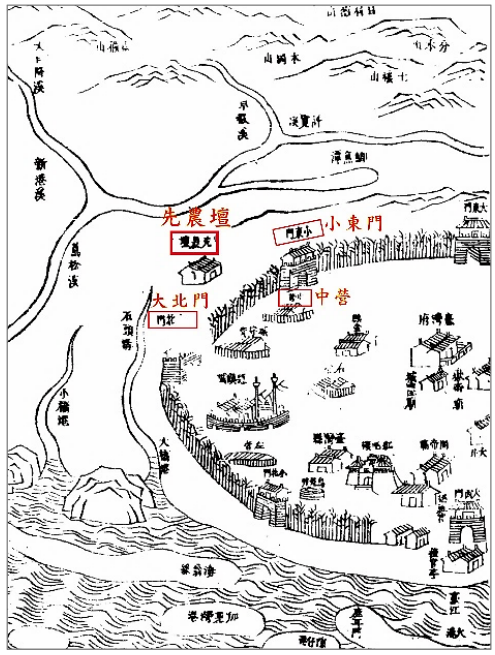
133 蔣元樞，《重修臺灣各建築圖說》，頁 55。

134 靈濟泉井或又名萬軍井。〈赤崁筆談〉載：「萬壽亭一泉，屯兵萬餘，汲取不窮，今名萬軍井。」參見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 50。

135 魯鼎梅主修，王必昌總輯，陳輝等編纂，《重修臺灣縣志》，頁 536；薛志亮主修，謝金鑾、鄭兼才總纂，《續修臺灣縣志》，頁 12。

136 余文儀主修，《續修臺灣府志》，福建臺灣全圖頁 5；蔣元樞，《重修臺灣各建築圖說》，頁 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十二　清乾隆年間《續修臺灣府志》〈臺灣縣圖〉(局部)

資料來源：改繪自余文儀主修，《續修臺灣府志》，福建臺灣全圖頁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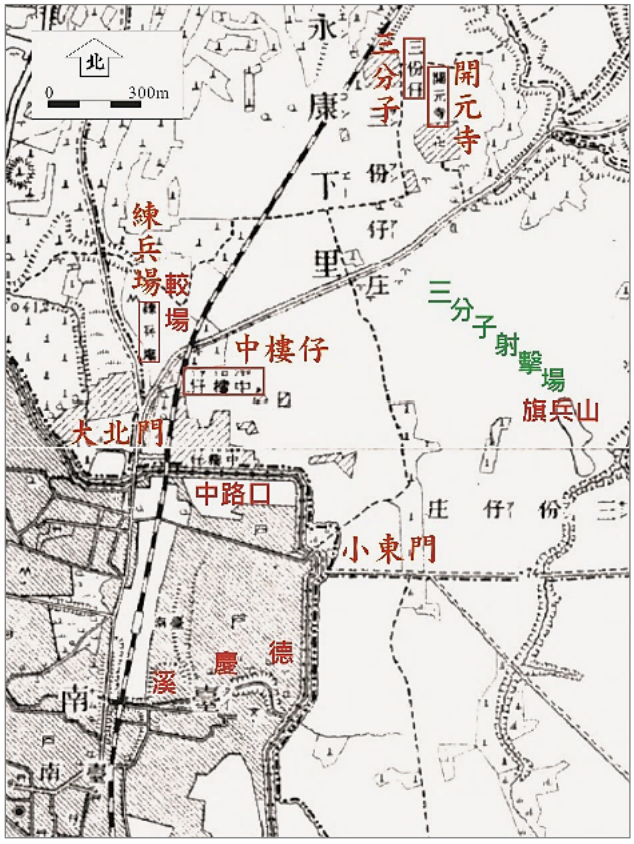
圖十三　清乾隆年間《重修臺灣各建築圖說》〈臺灣郡城圖〉(局部)

資料來源：改繪自蔣元樞，《重修臺灣各建築圖說》，頁 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萬壽亭與旗兵山

昔時府治東北城外、今北區重興里內原慈光十三村地區為小丘地形，日治時期屬三分子射擊場之範圍，戰後國軍曾沿用該設施，當地居民俗稱「打靶山」，有清一代又舊呼「旗兵山」（圖十四）。[137]據傳此處在當時乃是駐軍之地，因而得名。



圖十四　旗兵山與中樓仔的地理位置

資料來源：改繪自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臺灣堡圖（下冊）》，頁 344、399。

137 楊意，〈從怪手下搶救出來的眷村文化——重興社區竹籬笆裡又見春天〉，《新台風》第 12 期（2007 年 7 月，臺北），頁 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康熙六十年（1721），臺灣發生朱一貴事件，福建水師提督施世驃（1667-1721）與南澳鎮總兵官藍廷珍統領兵員一萬數千名渡臺平變。[138]藍廷珍分兵西港仔南下，於木柵仔、蔦松溪敗朱一貴部；原在城內之朱一貴聞訊出走，「率其黨顛連北去」，嗣後藍廷珍掃肅萬壽亭之逸賊，並駐兵此地，施世驃則率師屯北較場。[139]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起事反清，次年春初分路進攻郡城，時任臺灣鎮總兵官柴大紀（1732-1788）鑒於郡治僅圍木柵莿竹難以固守，故調撥兵力於離城稍遠之總口要地先行堵防，北則鹽埕橋、南則桶盤棧、西則三鯤鯓與大港，在東由守備邱能成、李步雲統兵駐舊萬壽亭以禦中路，兼援大、小南門。[140]

如上所述，萬壽亭一帶在朱一貴、林爽文兩大民變事件中均是清軍的駐防場域，與「旗兵山」之名若符合節。若將《欽定平定臺灣紀略》所言之「舊萬壽亭」視成柴頭港溪西萬壽亭周圍空曠地界的指涉，並非特定點位稱呼；「離城五里」之處乃係「旗兵山」，而仁愛里西境之東豐路兩側地區約在旗兵山西側一里至二里距離內，如此相契於《重修臺灣縣志》與〈新建萬壽宮碑記〉中萬壽亭去城三里之說，前節推估的萬壽亭位置範圍顯存有合理性。

（三）萬壽亭與德慶溪

德慶溪早昔是府城重要水系之一，道光年間成書的《臺灣采訪冊》對其流路有較為完整的描述，文字內容如下：

> 德慶溪（俗呼坑仔底）源出小東門外舊萬壽宮前，入郡城東安坊，

138 丁紹儀，《東瀛識略》，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頁 86；藍鼎元，《平臺紀略》，頁 11。

139 藍鼎元，《東征集》，頁 9；藍鼎元，《平臺紀略》，頁 16；劉良璧纂輯，《重修福建臺灣府志》，頁 427；六十七、范咸纂輯，《重修臺灣府志》，頁 354-355；魯鼎梅主修，王必昌總輯，陳輝等編纂，《重修臺灣縣志》，頁 342；余文儀主修，《續修臺灣府志》，頁 444-445；薛志亮主修，謝金鑾、鄭兼才總纂，《續修臺灣縣志》，頁 371。

140 不著撰人，《欽定平定臺灣紀略》，頁 150；不著撰人，《平臺紀事本末》，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頁 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合舊縣署後並府署東二泉，西流至竹仔行，會枋橋頭水合流，經縣署右，至水仔尾，出小北門外北廠，注於臺江（此郡城內之右分水）。[141]

德慶溪日後經歷工程改變，以箱涵加蓋方式營造成為舊臺南市北幹線排水系統主線，河道現已從地面上消失。

北排水主幹線係源起成功大學勝利校區與臺南一中交界處，地形上呈現凹窪態勢，德慶溪源頭遂定位此地；舊縣署與府署東兩泉流路，相當於前鋒路旁與博愛國小前水溝；枋橋頭水或說源起清水寺附近（沿行開山路 3 巷向西），或說源在延平郡王祠東北角（沿行府前路一段 122 巷向北接開山路 3 巷），於中西區區公所右向北穿青年路、中山路，經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前、吳園（舊稱枋橋頭之地），至遠東百貨公司（舊稱竹仔行之地）匯入德慶溪，今日河道亦已箱涵化。[142]

萬壽亭初址在東區東寧路北側、成功大學勝利校區範圍內之說，顯然和該地濱鄰德慶溪源頭，合於舊志內所言德慶溪源出舊萬壽宮前關連密切。惟勝利校區宿舍位於昔日府城東垣中段外側，沿城垣計算，該地與大東門、小東門兩地間的地理距離相去無多，[143]並未明顯近於小東門，且依此對照陳璸〈新建文昌閣碑記〉的內容，則萬壽亭難稱座落文昌閣之北，言其居東更為適切。

另有記載，原空軍醫院（今民生路二段近中華西路路口處）附近有東豐幹線將臺南公園與臺南二中周邊之逕流引進前身是德慶溪的北幹線。[144]東豐幹線源頭有二，一股來自今臺南二中校區北側，另一股來自臺南二中校區西側，兩股水路於校區西北隅合流後，向西經西門路四段 16 巷 31 弄、西門路四段 16 巷南側、越西門路進西門路四段 1 巷，南轉

141 陳國瑛等採輯，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采訪冊》，頁 11。

142 范勝雄，《府城叢談——府城文獻研究（一）》，頁 9；施添福總編纂，王世慶編纂，許淑娟等撰述，《臺灣地名辭書（卷廿一）——臺南市》，頁 152、154。

143 緣於此項特徵，文獻中遂有以「德慶溪源出小東門、大東門間」之敘述方式。參見范勝雄，《府城叢談——府城文獻研究（三）》，頁 41。

144 范勝雄，《府城叢談——府城文獻研究（一）》，頁 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育德公園西邊，入民德路、海安路三段 219 巷、文賢路 292 巷、文祥街接德慶溪。[145]東豐幹線過西門路後進入原為台江內海的水堛區，德慶溪在今臨安路以西河段亦同，故內海浮覆發生前，兩水應各自注流台江，未具主、支流關係。

日本大正七年（1918）刊行的〈臺南市全圖〉上，原衛戍醫院、今成功大學力行校區之南、北兩側繪有地面水路，西流入臺南公園內之燕潭後，再北折沿中學校（今臺南二中）西側公園路而去（參圖十五），[146]名為「文元溪」，戰後地圖顯示其乃東豐排水幹線南源。[147]地方人士流傳，古昔燕潭西南的總爺街（今崇安街）也有水路，當燕潭溢流時，潭水便是經總爺街水路向西南至總祿境下土地公廟附近入德慶溪河道。[148]換言之，成功大學力行校區南、北兩股水流或據此得以被稱為德慶溪支流。假設如是，而萬壽亭定位在力行校區旁的仁愛里境西部，確符合德慶溪源出萬壽亭前之說。然方志中云德慶溪自東安坊進入郡城，並匯舊臺灣縣署和臺灣府署附近泉流，舊臺灣縣署和臺灣府署均在東安坊內，[149]總爺街水路則地處鎮北坊，兩者間有所出入，顯見前論未臻周全。

萬壽亭是清代臺灣舉行官方儀典的祠宇之一，居城邑外寬曠邊陲之地，在缺乏其他地物設施得作基準之情況下，自然可能成為鄰近區域表述相對位置時的主要參考地標。北區仁愛里西境東豐路一帶與德慶溪源同在府城東垣外，兩者南北相距約有 1 公里之遙，早年其間能否通視難以研判，但就空間資訊的呈現而言，若本文所論證之舊萬壽亭位置為是，因該建物座北向南，德慶溪流域上游地處其正南方，故「德慶溪發源於小東門外萬壽亭前」的敘說並未悖離事實。

145 U. S. Army Map Service, Sheet 2116-III-SE, “Taiwan (Formosa) 1:25,000 (L892).” (Washington D.C.: Army Map Service, 1944); 范勝雄，《府城叢談——府城文獻研究（一）》，頁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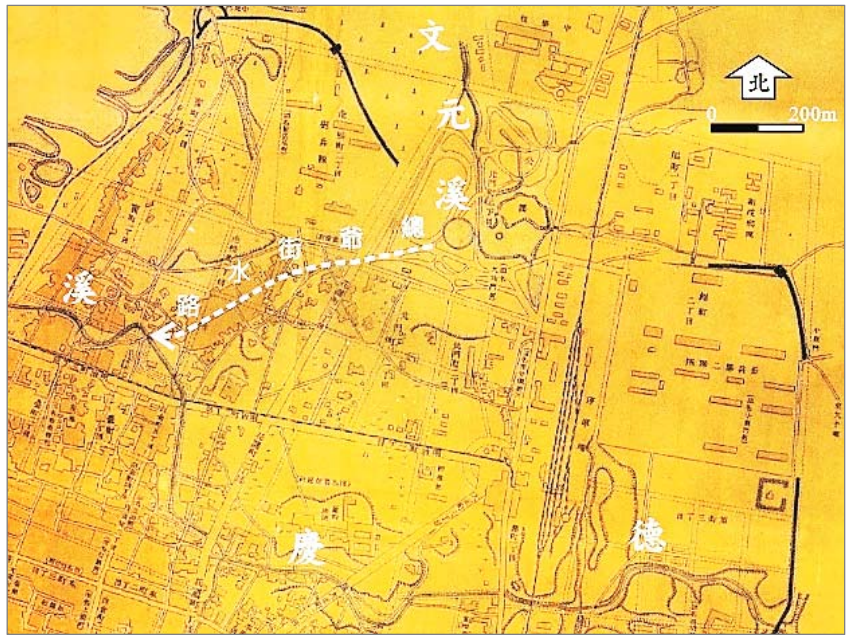
146 臺南廳，〈臺南市全圖〉，收入謝國興總纂，《續修臺南市志（卷首）》，圖 0-0-5-11。

147 沈澄淵、魏新泉，〈臺南市街詳細圖〉（高雄：興臺文化出版社，1971）。

148 臺灣英文新聞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穿梭府城今昔》（臺南：臺南市政府，2009），頁 109。

149 洪敏麟，《臺南市市區史蹟調查報告書》，頁 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十五　總爺街水路流徑示意

資料來源：改繪自臺南廳，〈臺南市全圖〉，收入謝國興總纂，《續修臺南市志（卷首）》，圖 0-0-5-11。

四、萬壽亭區位意涵之探析

（一）區位選擇

1. 基址環境的考量

清領臺之初，曾規劃建臺灣府城於永康里內，[150]並擬採磚石起造。[151]確切的城池地點史料未載，基址範圍甚可能在崁頂山。[152]

150 高拱乾纂輯，《臺灣府志》，頁 27；陳璸、周元文纂輯，《重修臺灣府志》，頁 29。

151 《臺灣縣志》載：「郡縣既設，城池其首務焉。……二十二年歸入版圖，……未遑議及；即欲商建造，而磚石之屬，皆取資於內地，工力又數倍焉。」顯示原初的築城規劃似擬採用磚石為建材。參見王禮主修，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頁 69。

152 石萬壽，〈臺南府城的城防〉，頁 14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舊臺南市分為安平平原、臺南台地、櫻丘沙丘群和大灣低地 4 個地理區，[153]臺南台地即是崁頂山，區內「小阜嶔崎，散布南北，迢迢二十餘里，為郡城第一平障」。[154]台地外各區土壤趨於深厚，屬沖積或風積沙土，膠結鬆散至中等緊密，[155]因臺島好發地震，上述條件土地難以提供興建磚石城垣的穩固基礎，故臺灣鎮第二任總兵官殷化行（1643-1710）對於府治築城的議論方有言道：「地多浮沙，時震動，城之不易。」[156]相權之下，鄰近府邑的臺南台地土壤堅實，開築磚石建物的條件稍較適宜。[157]

康熙末年，藍鼎元（1680-1733）致書閩浙總督覺羅滿保（1673-1725），力陳府治建城之必要性和急迫性，且分析臺島粉沙地堆築土寨易崩而實效罔然、木柵日曝雨曬下易腐而不能長遠、沙灰土三合牆工本浩大未遜於磚石材料，遂提議在萬壽亭附近用灰砌磚築城，以一勞久固。[158]萬壽亭初址無論是現傳的成功大學勝利校區南緣或本文推定的仁愛里境西部，皆座落崁頂山西翼之地。藍鼎元相取舊萬壽亭空曠之所為磚城擬建地點，其考量也許與早年臺灣府城池卜在永康里者相同。

爾後基於聚落發展現狀，臺灣府城係就邑治四坊為主體圍出城廓，未另建在永康里境；城牆歷經雍正朝至乾隆朝的幾次更繕，最終也放棄採用磚石修築，改以三合土為構材。[159]由清代臺灣府城建築的討論過程中可知，磚石資源須取自內地，運輸困難、耗費成本龐大，固然為決行設置土牆的最主要因素，[160]當中卻不全無府治平野緩地土質鬆散，缺乏

153 呂秉城等主修，鍾廣吉纂修，《臺南市志（卷一）——土地志地理篇》（臺南：臺南市政府，1979），頁 1。

154 不著撰人，《臺灣府輿圖纂要》，頁 103。

155 范勝雄，《咱兮土地咱兮人》（臺南：臺南市政府，2000），頁 22。

156 李元度，《清先正事略選》，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9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頁 14。

157 石萬壽，〈臺南府城的城防〉，頁 143；范勝雄，《咱兮土地咱兮人》，頁 22。

158 藍鼎元，《東征集》，頁 27-28。

159 石萬壽，〈臺南府城的城防〉，頁 152。

160 王禮主修，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頁 69；陳國瑛等採輯，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大規模起造磚石建築之良好基址條件的考量。萬壽亭建築規模小於臺灣府城垣，惟象徵尊崇，為求其基礎堅實永固、棟宇穩定經久，亭址的選擇就臺南台地（崁頂山）而捨他處，即使非屬絕對必要，亦是相對充分，以環境條件觀之乃有道理可循。

2. 空間意義的生產

自普羅民遮（Provintia）市街的開發為始，之後數百年演變歷程中，十字大街長期位居發展軸心，[161]故若將府邑以德慶溪主流為界線，劃分成兩部，則南半部的都市化顯然速度較快、程度較高。康熙三十五年（1696）《臺灣府志》列四坊市鎮 15 處，康熙五十九年（1720）《臺灣縣志》列坊內集市 26 處，德慶溪以南便各計有 14 處與 25 處，溪北為過坑仔街（總爺街）1 處。[162]從光緒朝的〈臺灣府城並安平海口圖〉得以看出，其時府城南半部路巷已稱繁密交錯，街市眾多，各諸文事官署、寺廟祠宇星布。反之，北半部地區大多為軍事營盤、武職衙署或相關設施據駐，域內仍徑絡稀疏，僅區內西側出現總爺街、大銃街等街市。[163]

相對於民商輳集之赤崁市坊，溪北地區可謂聚居核心的外緣區帶，土地利用較為粗放，鄭氏時期或即是駐軍場域，[164]入清後臺灣鎮總兵署、鎮標中營、左營、右營營盤沿設於此，其北並有較場。臺灣鎮總兵官為

《臺灣采訪冊》，頁 24。

161 十字大街以今日之民權路、忠義路為代表，因兩道路分別相當於清代時的西定坊大井頭街與鎮北坊禾寮港街，亦即荷治時期的普羅民遮市街和赤嵌街。參見范勝雄，〈臺南市區里變革初探〉，頁 22、59；石萬壽，《樂君甲子集》，頁 499、503。

162 高拱乾纂輯，《臺灣府志》，頁 46-48；王禮主修，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頁 90-92。

163 魏瀚等，〈臺灣府城並安平海口圖〉。

164 〈永曆十八年臺灣軍備圖〉顯示，鄭經來臺後，赤崁城附近有侍衛、勇衛、左武衛、左虎衛、右虎衛駐守；而據《臺灣縣志》所載，鎮屬公署均由鄭氏時期舊宅重修而來，因此推論鎮屬營盤或為前朝駐軍場域。參見陳漢光、賴永祥編，《北臺古輿圖集》（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57），頁 5；王禮主修，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頁 7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駐臺最高階級武員，秩正二品，名義上統馭萬員，實數約莫 9,000 人上下；[165]鎮標三營由總兵官直轄，戍衛首邑，兵將員額計 2,700 餘名，[166]佔全臺兵力三成，雍正年間再增置城守營。如此軍事要域，區內及鄰近地界之活動自然多有管制限束。

乾隆中葉，臺灣城外東、北隅野墳丘已眾，清明日掃墓人群大量聚集，官府需遣派武力維持治安，以備彈壓。時任鳳山縣教諭之朱仕玠（1712-?），於其撰著的《小琉球漫誌》中對此有所著墨：

> 府治東、北二門外，墳塋甚夥。……每歲三月清明日，民家合宅男女，邀集親戚上墳，祭畢則聚飲墳上，而輕薄之徒，亦借名遊觀，人跡麇至，以千萬計。是日例撥佐雜一員，武弁一員，領衙役兵丁鎮壓，以防惡少滋事。[167]

當時的清明監防舉措，應與府城北半部軍事設施密集、敏感度高，北、東郊野環鄰其外，民眾雜遝易有變故之虞關連密切。

另，〈茅港尾紀略〉記載，林爽文事變時，總兵梁朝桂（?-1794）奉命來臺協援，茅港尾街先民代整天后宮和觀音亭充作其部旅營舍，並為嚮導。事平，梁朝桂有感於當地媽祖保佑和居民幫助，奏請朝廷下詔敕封天后宮並賜匾額，茅港尾媽祖且有恩加禮遇。

> 故當我茅全盛之日，神輿晉郡，入謁臺南天后宮，有大北入、大北出之特例，即自大北門入、出亦從大北門也；別莊則無此特典。……雖北港朝天宮媽祖亦無以加榮焉。[168]

昔日茅港尾天后宮媽祖神輿可從府治大北門進出，係為「特殊恩典」，非一般廟宇所能仿行。推敲其緣由亦在臺府神明巡謁繞境活動頻繁，隨香人眾，如放任各隊伍行經兵防要地，而當中混入歹徒叛黨，恐會致生

165 許雪姬，《清代臺灣的綠營》，頁 9-10、137。

166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通志》，頁 694。

167 朱仕玠，《小琉球漫誌》，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頁 58-59。

168 黃清淵，〈茅港尾紀略〉，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輿地彙鈔》，頁 13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威脅事端。

營盤及較場設施保安需求較高，屬性趨向封閉，罕親民事，且佔地面積較大，土地利用上排他性強烈。府邑北半部廣闊之鎮標基地抑制了日後區內市街的成長，[169]也使得該空間被賦予或被營造的軍事意象更加鮮明。德慶溪以北之地，是臺島維安需求下形成的高等級軍事機能區，萬壽亭則為顯現國家意識形態的象徵場域，兩處傍鄰，後者皇權空間意象得以藉助前者的軍權空間拱護而穩固宣示，前者軍權空間運作亦得以依憑後者的皇權空間建構而強化維續。昔日萬壽亭選址之衡慮因素雖不得詳知，然其與鎮標營署分布區共同形塑、相互生產出臺灣最高治權核心場域的空間意義應是存在。

（二）區位重要性

舊萬壽亭區位所呈現的重要性，即其於府治中路地帶之軍事防務上具有的戰略地理價值，此特徵使之可與德慶溪北的鎮營所在地域產生功能空間的緊密連結。

臺灣歸清後，「中路」的空間概念具體反映於行政區域之設置，初期以臺灣府治為準，附郭縣（臺灣縣）居三縣之中，故曰中路，東至保大里大腳山五十里為界。[170]當時鎮標中營駐劄臺灣縣永康里內，址在邑治東北隅，稱「中路口」。[171]營界自赤崁樓東北方之德慶溪北岸起，向東經右營營盤北側，折沿東安坊東緣南下，再轉向東，橫亙崁頂山南段至歸仁里，與右營為鄰；往北沿總鎮營盤東側抵較場附近，迤東

169 蘇怡帆，〈臺南城內地區空間結構之變遷（1625-1929）〉（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2011），頁 37。

170 陳璸、周元文纂輯，《重修臺灣府志》，頁 27；王禮主修，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頁 1、5。

171 高拱乾纂輯，《臺灣府志》，頁 30、69、75；王禮主修，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頁 70、72、109；許雪姬，《清代臺灣的綠營》，頁 12。按：康熙二十四年（1685）修纂之《臺灣府志》云臺灣鎮中營衙門在東安坊。參見蔣毓英，《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 1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經中營營盤北，穿柴頭港溪源、崁頂山之北、鯽魚潭下游至保大里，與左營相毗。[172]

府治東倚崁頂山地，「中路口」東北方的崁頂山北緒因地勢較趨平緩，利於郡邑東向的交通開展，《臺灣府輿圖纂要》記載出小東門經石頭坑（今開元橋南之柴頭港溪西源）、竹林仔（今開元寺東南之柴頭港溪東畔）、塗虱堀（今永康網寮北部）、大灣莊（今永康大灣）、塗庫仔（今仁德土庫）至埤仔頭王宮（今關廟埤頭）一線，[173]便是繞越崁頂山北端，康熙末年邑內往長興里、保大里的道路取徑與其相仿。鎮標中營（中路口）位在途中，[174]且處郡邑內、外交界地帶，為「中路出入府城之口」，顯居藩衛。

「中路口」西北角外為「中樓仔（街）」（圖十四），在南北大路上，為南下行旅入邑前最後一處停駐點，從之北上，經大橋、小橋可抵新港社，[175]該路徑的前身很可能是 1644 年荷人所建赤崁往新港本社的大路。〈赤崁地區農地與道路圖〉內得見自普羅民遮街往東北過鯽魚潭北側續行之筆直道路，[176]估測即為新港社大路。荷治時「中樓仔」之名或已存在，1650 年〈赤崁耕地登錄表〉中載有「Hoorns Polders ofte Tonglouw」，「Tonglouw」被認為是其荷語音譯。[177]「中樓仔」位於普羅民遮街和大橋兩地中間，斯時田園闢成，應有民住居。[178]據而揣斷，

172 不著繪人，〈康熙臺灣輿圖〉。

173 不著撰人，《臺灣府輿圖纂要》，頁 114-115；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臺灣堡圖（下冊）》，頁 344、394、399；廖瑞銘總編纂，《永康市志（上卷）》（臺南：永康市公所，2010），頁 120、125。

174 王禮主修，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輿圖頁 9-11。

175 不著繪人，〈康熙臺灣輿圖〉；王禮主修，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輿圖頁 9-15；不著繪人，〈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不著撰人，《臺灣府輿圖纂要》，頁 114。

176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編，《縱覽台江》，頁 34-35。按：該圖被認為是 1644 年或 1650 年製作。

177 翁佳音，〈從舊地名與古地圖看臺灣近代初期史〉，收入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臺灣史十一講》（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6），頁 76。

178 〈赤崁地區農地與道路圖〉顯示當時普羅民遮街以東至崁頂山、以北至蔦松溪下游之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新港社大路當通經「中樓仔」，由此建構的交通區位條件並奠立了日後「中樓仔街」發展基礎，成為清代臺灣方志中不乏列載之地。[179]

有關「中樓仔」地名的源起，石萬壽指出是「重樓仔」之訛轉。重樓為樓閣型式的房舍，因鄭氏時期東寧總制使陳永華在燕潭之東興建重樓充作宅第，後發展成地名。[180]翁佳音主張「中樓仔」係「中路仔」的音轉，由舊昔南、北路的治理空間概念相對而生，是以日治時期《臺灣堡圖》內標記之「中（テヨン）樓（ロー）仔（アー）」，發音同於閩南語的「中『路』（lōo）仔」，非「中『樓』（lâu）仔」。[181]東寧總制使樓閣建築的存在，尚需查考詳證。[182]又，若荷蘭文獻中的「Tonglouw」確為「中樓仔」，則總制使重樓說顯然欠缺時間邏輯。「中樓仔」甚早就是赤崁邑治聯外交通往來的主要站點，雖據北路，但府治城柵未築前與「中路口」域境毗連，原意「中路仔」乃有脈絡可釋。

中路口與中樓仔附近地帶是郡治中路的門戶樞紐，萬壽亭設址與其相邇，附近地境寬曠，利於紮營，且其位在鎮標中營與崁頂山北端孔道之間，和中營同扼府邑中路北線幹道，亦係要衝。雍正年間城柵建竣，

地，大多已被劃歸田園地。〈赤崁耕地登錄表〉內中樓仔之田園地，荷人稱「荷恩田園地（Hoorns Polders）」。參見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編，《縱覽台江》，頁 34-35；翁佳音，〈從舊地名與古地圖看臺灣近代初期史〉，頁 76，及其〈臺南成大中樓仔：地名的野生思考（一三九）〉（2017 年 11 月 30 日），https://www.facebook.com/kaim.ang.7（2018 年 3 月 31 日檢索）。

179 乾隆朝《重修臺灣府志》載中樓仔街在歸仁北里，係中路，對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之內容，列在歸仁北里之街市應為舊社街，前者記述有誤。參見劉良璧纂輯，《重修福建臺灣府志》，頁 84；六十七、范咸纂輯，《重修臺灣府志》，頁 75。

180 石萬壽，〈王爺信仰與延平王君臣關係之探討〉，頁 225。

181 翁佳音，〈臺南成大中樓仔：地名的野生思考（一三九）〉。按：翁氏原文內「路」之羅馬拼音作 lōu，今依《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作 lōo。參見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2008 年 10 月），http://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default.jsp（2018 年 3 月 31 日檢索）。

182 〈王爺信仰與延平王君臣關係之探討〉一文中，係以燕潭東曾有之黃蘗寺為陳永華宅舊址，而陳永華的總制身分方具興建「重樓」資格為論證基礎。參見石萬壽，〈王爺信仰與延平王君臣關係之探討〉，頁 225-2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府城形成內、外之別，鎮標中營劃歸城內，後專責郡邑彈壓；城外的萬壽亭及周緣地區在位置上正適以作為禦守中路、控制小東門的屯兵要地，軍事重要性不言可喻。

結 語

作為清代臺灣皇權統治的重要象徵，萬壽亭是一處政治意涵濃厚的「神聖空間」，係舊志祠宇記載中未可略者，但經歷數百年來的人事變化，今日遺跡難尋。自康熙五十年（1711）肇建後，萬壽亭漸被賦予了生活空間系統上的地標意義，並發展成為府郊永康里境的主要地名之一。乾隆十七年（1752），三大節儀典改回臺灣府文廟的明倫堂內舉行，萬壽亭的政治神聖性因此發生空間轉移，功能上易為宗教場域，惟其具有的地名空間指涉功能至晚於乾隆朝後葉仍然存在。此外，萬壽亭區位於府城中路軍事防務上的重要價值，也使之在康熙末年臺灣城興築範圍的討論過程中屢被提及。[183]

萬壽亭繫於朝廷觀瞻，關乎國家緊要，舊籍中有關其初址的描述文字卻未得謂詳明，今相關文籍或許因古志內記載萬壽亭南向且前有德慶溪流經之說，故推斷改造德慶溪河道而成之北幹線排水主線的北岸，即成功大學勝利校區內，乃該亭肇建地點。本文藉助清代輿圖的比對查考，配合文書記載內容的檢視梳理，歸納得出舊萬壽亭基址點位座落於小東

183 《東征集》〈復制軍論築城書〉云：「似不如明題請旨，就臺地特開捐輸城工事例，于萬壽亭寬曠處所，用灰砌磚築一不大不小之城，將文武衙署、倉庫監房俱包在內，深鑿濠塹，密布樁簽，方為長久至計。」〈與制軍再論築城書〉又云：「於萬壽亭曠地築一小城，……尚是畏難苟安之見。……北從總兵大營後圍起，環臺灣縣署而東，……而北環左營遊擊營署；計一週不過十里。惟截出中營、萬壽亭、春牛埔、土墘埕、渡頭在外。」〈覆制軍臺疆經理書〉再云：「茲承憲檄，栽竹為城，價廉工省，此亦因時制宜，不得不然之勢。謹即會同勘度。環萬壽亭、春牛埔，將文武衙署、民兵房屋、沿海行舖，俱為包羅。」參見藍鼎元，《東征集》，頁 28-29、38-3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門、開元寺和大北門間的三角地帶中，介於臺灣鎮標中營營盤和開元寺（海會寺）兩地一線之間，距開元寺約莫清里制 1 里至 2 里，鎮標中營營盤地則應係現成功大學光復校區，據此重新界定萬壽亭初址約在北區仁愛里西境之東豐路附近。此一推定範圍得以由其與先農壇的空間使用變化脈絡關係暨兩者之位置比對，與旗兵山的地理鄰近性及軍事空間功能的歷史關連，以及與德慶溪相對位置敘寫的事實邏輯再解釋等三個面向中獲得論證支持。

萬壽亭初址設置於遠離郡邑聚居中心的城外東北郊里、崁頂山（臺南台地）之西側，除與臺南台地土壤較為堅實的基址環境條件可能有關之外，在孤懸於中土海外、遠離統治中樞的臺灣，萬壽亭等同帝廷的皇權象徵，與鄰近之德慶溪北軍事機能區相互生產治權核心場域的空間意義，即使非為亭址取決時之考量因素，亦可能是伴隨區位選擇而萌發的結果。此外，舊萬壽亭居處府治中路北線幹道之上，地界寬曠利於屯兵，西南可制郡城小東門、東北可控崁頂山北端往來孔道，對中路防務而言，係屬戰略重鑰，該特徵亦使之得以和臺鎮軍事營地產生功能空間的緊密連結。至日治時期，上述的連結空間承續了軍事指揮中心機能，呈顯於三分子射擊場（萬壽亭附近）、衛戍醫院（中樓仔）、騎兵隊、步兵聯隊駐地（舊鎮標中營營盤）、偕行社（城守營一帶）、練兵場及陸軍倉庫、經理部（右營營盤附近）、臺南練兵場（較場）、砲兵營和工兵營地、經理部出張所、步兵聯隊軍官宿舍（總鎮營盤和左營營盤一帶）等設施之先後配置，再幾經變遷，方成校園、公園、醫院、藝文空間、軍眷國宅為主的現貌，並留存了若干文化資產。原萬壽亭址的區位意涵聯繫了清代郡治中自崁頂山至城西、從馬房山到德慶溪間蘊含權力意象和軍事功能的大規模地景，其乃俾助於理解並形塑今日當地文化資產空間的歷史脈絡價值。

本文研究過程中亦且察見，清代舊籍有關地物位置之文字記載大多趨於簡略，山水畫式輿圖有散點透視伴隨的空間幾何關係扭曲現象，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呈現的地理資訊內容未全然正確，但臺灣府城木柵建成後，今日臺南市區範圍的圖面資料與衍生資訊數量相對增加，在參考地標充實的條件下，透過多幅輿圖與文字的共同比對、分析和歸納，也能對府城一帶地方空間尺度之位置考證和區位意涵論述提供可資利用的有效訊息，此一概念工具之應用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性。

* 本文係改寫自作者於 2017 年 5 月 6 日在「2017 文化與區域研究學術研討會」（國立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主辦）發表的〈臺南萬壽亭初址探考〉一文，感謝該會議評論人林明璋教授提供的研究建議，另感謝本系蔡米虹副教授在寫作過程中的協助。本文審查人對於文中論述與引證提供了寶貴的修正和補強意見，使得內容能更趨完善，在此一併致申萬分謝忱。

（責任編輯：石昇烜　校對：李　頎　洪麗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史料文獻

丁宗洛，《陳清端公年譜》，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20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

丁紹儀，《東瀛識略》，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

王　揖撰，鄭明、王義耀校點，《野客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王　禮主修，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0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不著撰人，《平臺紀事本末》，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不著撰人，《安平縣雜記》，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5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不著撰人，《欽定平定臺灣紀略》，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0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不著撰人，《臺灣府輿圖纂要》，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8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不著撰人，《臺灣兵備手抄》，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22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

不著繪人，〈康熙臺灣輿圖〉。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藏。

不著繪人，〈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不著繪人，〈乾隆臺灣輿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不著繪人，〈福建臺灣地理全圖〉。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六十七、范咸纂輯，《重修臺灣府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0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編，《縱覽台江——大員四百年地輿圖（增訂初版）》。臺南：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2012。

丘　濬，《大學衍義補》，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1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朱仕玠，《小琉球漫誌》，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

余文儀主修，《續修臺灣府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2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李元度，《清先正事略選》，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9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

李元春，《臺灣志略》，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李丕煜主修，陳文達等編纂，《鳳山縣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2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李閩權，〈新修城隍廟前石道記〉，收入六十七、范咸纂輯，《重修臺灣府志》，頁 693-694。

吳桭臣，〈閩遊偶記〉，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輿地彙鈔》，頁 11-27。

沈葆楨，《福建臺灣奏摺》，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29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林天人編撰，《皇輿搜覽——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明清輿圖》。臺北：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2013。

郁永河，《裨海紀遊》，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4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高拱乾纂輯，《臺灣府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6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秦蕙田，《五禮通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陳國瑛等採輯，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采訪冊》，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5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陳壽祺總纂，魏敬中纂修，《福建通志臺灣府》，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8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陳　璸、周元文纂輯，《重修臺灣府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6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陳　璸，〈建文昌閣詳文〉，收入王禮主修，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頁 233-234。

陳　璸，〈新建文昌閣碑記〉，收入王禮主修，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頁 252-254。

陳漢光、賴永祥編，《北臺古輿圖集》。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57。

梁文科，〈重修萬壽亭碑記〉，收入王禮主修，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頁 254-255。

連　橫，《臺灣通史》，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2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

黃清淵，〈茅港尾紀略〉，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輿地彙鈔》，頁 127-140。

董天工，《臺海見聞錄》，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29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劉良璧纂輯，《重修福建臺灣府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7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劉　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點校本。

魯鼎梅主修，王必昌總輯，陳輝等編纂，《重修臺灣縣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1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蔣元樞，〈恭修萬壽宮碑記〉，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南部碑文集成》，收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文獻叢刊》第 218 種，頁 100-101。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
蔣元樞，《重修臺灣各建築圖說》，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28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0。
蔣允焄，〈新建萬壽宮碑記〉，收入薛志亮主修，謝金鑾、鄭兼才總纂，《續修臺灣縣志》，頁 499-500。
蔣毓英，《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盧德嘉纂輯，《鳳山縣采訪冊》，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7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薛志亮主修，謝金鑾、鄭兼才總纂，《續修臺灣縣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4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藍鼎元，《東征集》，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藍鼎元，《平臺紀略》，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藍鼎元，〈李弁茂吉傳〉，見錢儀吉彙纂，《碑傳選集》，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220 種，頁 462-464。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
覺羅滿保，〈題義民效力議效疏〉，見余文儀等主修，王瑛曾編纂，《重修鳳山縣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46 種，頁 343-346。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四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8。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輿地彙鈔》，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21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一統志臺灣府》，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6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通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3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世宗實錄選輯》，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6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戊集》，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79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臺灣總督府土木部，〈臺南市區改正計畫圖〉。臺北：臺灣總督府土木部，1911。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臺灣堡圖（下冊）》。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6。
臺南廳，〈臺南市全圖〉，收入謝國興總纂，《續修臺南市志（卷首）》，圖 0-0-5-11。
臺南廳編，《臺灣省南部臺灣誌（三）》。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魏　瀚等，〈臺灣府城並安平海口圖〉，收入謝國興總纂，《續修臺南市志（卷首）》，圖 0-0-5-2。
謝國興總纂，《續修臺南市志（卷首）》。臺南：臺南市政府，1997。
謝國興主編，林天人圖說編撰，《方輿搜覽——大英圖書館所藏中文歷史地圖》。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20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石岡豬四郎等，〈臺南府迅速測圖（臺南市街圖）〉，收入謝國興總纂，《續修臺南市志（卷首）》，圖 0-0-5-8。
黑田菊之助，〈臺南市全圖〉。臺南：黑田書店，1915。
U. S. Army Map Service, Sheet 2116-III-SE, “Taiwan (Formosa) 1:25,000 (L892).” Washington D. C.: Army Map Service, 1944.

二、近人研究

王爾敏，〈清廷《聖諭廣訓》之頒行與民間之宣講拾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2 期（下），1993 年 6 月，臺北，頁 255-276。
石萬壽，〈臺南府城的城防——臺南都市化研究之一〉，《臺灣文獻》第 30 卷第 4 期，1979 年 12 月，南投，頁 140-166。
石萬壽，〈臺南市寺廟的建置——臺南市寺廟研究之一〉，《臺南文化》新第 11 期，1981 年 6 月，臺南，頁 39-74。
石萬壽，〈臺南市宗教誌〉，《臺灣文獻》第 32 卷第 4 期，1981 年 12 月，南投，頁 3-56。
石萬壽，《樂君甲子集》。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04。
石萬壽，〈王爺信仰與延平王君臣關係之探討〉，《臺灣文獻》第 60 卷第 1 期，2009 年 3 月，南投，頁 197-232。
沈澄淵、魏新泉，〈臺南市街詳細圖〉。高雄：興臺文化出版社，1971。
洪敏麟，《臺南市市區史蹟調查報告書》。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9。
洪英聖，〈康熙、乾隆「臺灣輿圖」的聚落發展〉，《弘光人文社會學報》第 13 期，2010 年 11 月，臺中，頁 1-26。
李文良，《清代南臺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1680-1790）》。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1。
李亦興，《臺灣的龍山寺》。臺北：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
李其霖，〈清代臺灣軍工戰船廠的興建〉，《淡江史學》第 14 期，2003 年 12 月，臺北，頁 193-215。
呂秉城等主修，鍾廣吉纂修，《臺南市志（卷一）——土地志地理篇》。臺南：臺南市政府，1979。
吳　洛，《中國度量衡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吳遐功，〈明鄭時期二層行溪流域漢人之拓墾〉，《嘉南學報（人文類）》第 31 期，2005 年 12 月，臺南，頁 665-680。
施添福總編纂，王世慶編纂，許淑娟等撰述，《臺灣地名辭書（卷廿一）——臺南市》。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
范勝雄，〈臺南市區里變革初探〉，《臺灣文獻》第 34 卷第 3 期，1983 年 9 月，南投，頁 21-60。
范勝雄，〈「府城」西城故事〉，《臺灣文獻》第 43 卷第 4 期，1992 年 12 月，南投，頁 145-18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范勝雄，《府城叢談——府城文獻研究（一）》。臺南：臺南市政府，1997。
范勝雄，《咱兮土地咱兮人》。臺南：臺南市政府，2000。
范勝雄，《府城叢談——府城文獻研究（三）》。臺南：臺南市政府，2003。
翁佳音，〈從舊地名與古地圖看臺灣近代初期史〉，收入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臺灣史十一講》，頁 70-85。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6。
翁佳音，〈大橋的故事〉，《歷史月刊》第 230 期，2007 年 3 月，臺北，頁 34-37。
翁佳音，〈臺南成大中樓仔：地名的野生思考（一三九）〉，2017 年 11 月 30 日，https://www.facebook.com/kaim.ang.7（2018 年 3 月 31 日檢索）。
夏黎明，〈國家統治與知識生產：清代台灣地圖的繪製與區域發展〉，《興大歷史學報》第 15 期，2004 年 10 月，臺中，頁 39-59。
馬曉林，〈萬歲牌概說〉，《南開大學報》第 1270 期，2015 年 6 月，天津，版 3。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2008 年 10 月），http://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default.jsp（2018 年 3 月 31 日檢索）。
張祐綾，〈臺南市區時空地圖〉。臺南：B 面文化工作室，2016。
陳正祥，《臺灣地名辭典》。臺北：南天書局，1993。
陳鈴琴，〈死生之境：台南南郊竹溪沿岸墳場地景之文化與構成分析〉。嘉義：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許雪姬，《清代臺灣的綠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
梁二平，《中國古代海洋地圖舉要》。北京：海洋出版社，2011。
黃中明，〈日治地形圖在城市高程探討的應用——以臺南竹溪墳場為例〉，收入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編，《2015 臺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89-118。臺南：國立臺南大學，2015。
黃蘭翔，〈臺南十字街空間結構與其在日據初期的轉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19 期，1995 年 6 月，臺北，頁 31-59。
傅朝卿，《臺南市古蹟與歷史建築總覽》。臺南：臺灣建築與文化資產出版社，2001。
傅朝卿，〈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的歷史建構——從軍事到高等教育之空間演進〉，收入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編，《成功的道路——第一屆成功大學校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39-61。臺南：國立成功大學，2002。
楊　意，〈從怪手下搶救出來的眷村文化——重興社區竹籬笆裡又見春天〉，《新台風》第 12 期，2007 年 7 月，臺北，頁 17-19。
詹伯望，《半月沈江話府城》。臺南：臺灣建築與文化資產出版社，2006。
廖瑞銘總編纂，《永康市志（上卷）》。臺南：永康市公所，2010。
臺灣英文新聞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穿梭府城今昔》。臺南：臺南市政府，2009。
駱芬美，《被誤解的臺灣史：1553-1860 之史實未必是事實》。臺北：時報文化，2013。
賴建銘，〈臺南郡城史話〉，《臺灣風物》第 23 卷第 2 期，1973 年 6 月，臺北，頁 32-48。
劉益昌、許清保、吳建昇、郭俊欽，《台江國家公園及周緣地區人文歷史調查及保存規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研究成果報告書》。臺南：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2011。
戴文鋒，〈臺灣民間有應公信仰考實〉，《臺灣風物》第 46 卷第 4 期，1996 年 12 月，臺北，頁 53-109。
謝奇峰，《臺南府城聯境組織研究》。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3。
蘇怡帆，〈臺南城內地區空間結構之變遷（1625-1929）〉。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2011。

三、網路資源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灣百年歷史地圖——臺南市百年歷史地圖》（2016），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ainan.aspx.（2018 年 3 月 31 日檢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l Inquiry 61 (June 2018), pp. 393-446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I: 10.6253/ntuhistory.2018.61.08

A Study on the Initial Site and Location Implications of the Ceremony Palace Established in Qing Dynasty at Tainan

Chang, Po-yu*

Abstract

The Ceremony Palace (萬壽亭) for celebrating the emperor's birthday, Chinese new year's day, and the winter solstice festival was established officially in the capital of Taiwan Prefecture, Tainan, in 1711. The palace is no longer in existence. The initial site of the Ceremony Palace was positioned on the present day Sheng-Li campus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in the upstream northern area of De-Ching River,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record that De-Ching river originates in front of the south side of the Ceremony Palace.

In this study, the old Ceremony Palace is repositioned in the surrounding area of Dong-Fong Road in the western part of Ren-Ai village, about one kilometer from De-Ching River, based on analysis of ancient maps and texts produced in the Qing dynasty. This result can be supported by the context of spatial use change, geo-correlation of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re-explanation of geographic description that are related to the new inferential site. Geological conditions may be one of the significant factors for the siting of the Ceremony Palace. Given its closeness to elite force bases,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ul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No. 133, Sec. 2, Shu-Lin St., Tainan 70005, Taiwan (R.O.C.);
E-mail: pychang60@mail.nutn.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symbolization of imperial power provided by palace was able to support the spatial significance of northern Taiwan Prefecture as main governance center with the high level military importance of the neighboring area. Moreover, the Ceremony Palace was closely linked to the military functional space mentioned above because of its defensive strategic importance. The location implications of the Ceremony Palace, regarding to the formation of governing and military landscape in northern Taiwan Prefecture in the Qing dynasty, helps us to understand and reconstruct the historical contextual value of the existing local cultural heritage.

Keywords: Tainan, Ceremony Palace, De-Ching River, Ancient Maps, Location Implication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